

匯聚研究成果 提供學術資訊 建立交流平臺 推動文史研究

2012年3月31日第3期  
總第八十二期  
2008年9月13日創刊

記憶  
REMEMBRANCE

## 啟事

一、为建构和谐社会，更好地落实民间、小众、专业的定位，本刊拟从下期起，  
删除发送名单，以减少受众、缩小影响。

二、为节省读者时间，欢迎短文，长稿亦望文字省净。有注释者，请采用脚注。

三、本刊创刊时即已说明，本刊所发表的文章，除编者自撰的之外，其余文章不  
代表编者观点。特此重申。

## 《记忆》八十二期目录

### 【专稿】

[范世涛 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

### 【评论】

[阿 陀 遇罗克的罪名到底是什么——追踪遇罗克之死](#)

[匡卫群 一代人的悲哀与责任——读《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 【序跋】

[丁 东 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血的神话》序](#)

[宋以敏 写在前面的话——《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序](#)

**【读书】**

[童 话 读胡发云的小说《隐匿者》](#)

[夏 瑜 天地有正气：读《血的神话》有感](#)

[庄生蝶 竹幕后的血腥](#)

**【争鸣】**

[章无忌 视角——关于文革受害者闻佳争论之我见](#)

[聂树人 韩爱晶、蒯大富的记忆错位](#)

**【往事】**

[李平余 回忆大表姐朱明二三事](#)

[徐 罗 老彭，你魂归何处？](#)

**【问答】**

[沈迈克问：1966年7月上旬毛泽东的行止？](#)

[1、卜伟华的解答](#)

[2、余汝信的解答](#)

**【资料】**

女附中“八五事件”材料（王晶垚提供，徐小棣等人整理校对）

[1、宋彬彬谈话记要](#)

[2、王永海谈话记录](#)

[3、胡志涛谈话补记](#)

[4、汪玉冰 全校控诉会控诉记录](#)

[5、《宋淮云、刘秀莹谈8月6日上午校文革广播》（影印件）](#)

[6、《1966年8月5日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名单）》（影印件）](#)

**【来信选登】**

[1、金秋对“余程之争”的看法](#)

[2. 何晓铭（福建）谈81期的争鸣](#)

[3. 子愚谈《记忆》及对近两期的感想](#)

[4. 胡平谈马悲鸣文的失实之处](#)

【专稿】

## 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

范世涛

历史书通常将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一致通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通知》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sup>1</sup>但具体到各个单位，情况其实各有不同，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分析各单位文革开始阶段的具体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革到底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仅就北京市的学校来说，文革的开始时间早于“五·一六通知”。大体来说，在5月14日到6月1日之间，运动的模式是“开小组会”为主的模式，矛头针对“三家村”；6月1日晚，中央以公开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方式对此前运动提出严厉批判，这直接导致运动矛头转向各基层单位的领导。本文以卞仲耘书记领导北师大女附中文革的情况为案例，描述和解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在论述过程中，本文使用了两种北师大女附中同学的笔记：一为66届高三某班同学的个人日记（本文作者收集，以下简称《日记》），<sup>2</sup>该日记起自1965年5月28日，止于1966年7月17日，作者出身“革命军人”家庭，曾参加欢迎工作组，不久又与反工作组的少数同学“孤军奋战”近一个月；一为67届高二2班同学罗治的笔记，该笔记起自1965年2月20日，止于1966年7月13日，主要记录了这段时间校会和年级会的主要内容（以下简称《罗治笔记》），因作者不久去军训，回来后记录的主要是领导讲话了。

### 一、5月9日文革进入北师大女附中

5月9日，星期一，晴。这一天，北师大女附中一位高三同学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文化大革命”字样。她说，“万没想到，我竟赶上了一场比反右斗争还要激烈的阶级斗争！”

她这一天的日记全文是这样的：

---

<sup>1</sup> “五一六通知”

<sup>2</sup> 暂不披露姓名

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速度快得惊人，深入的程度也是没有料想到的。

昨天《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文章，对《三家村》的黑店、工具、喉舌——《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进行批判。

《解放日报》的文章题目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先前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丝毫不怀疑的，认为他们就是黑线的组成者。但万没想到《北京日报》、《前线》杂志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解放军报》的文章明确指出，“‘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光明日报》的文章题目是《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文章指出《北京日报》发表的所谓检讨，实质上“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文章以非常严肃的质问结尾：“我们不能不问《前线》和《北京日报》，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明明白白的事实告诉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并非什么学术上的争论，而是“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伟大而又深远的。“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万没想到，我竟赶上了一场比反右斗争还要激烈的阶级斗争！57年的反右斗争是全党全民同右派分子的一场大搏战。斗争的结果，锻炼了党，提高了人民的阶级觉悟，巩固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但也有不少人，在疾风大浪中迷失了方向，坠入了右派分子的大泥坑。今天，在这场更大更激烈更深入更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应该以什么姿态自居呢？这不是嘴



巴能够回答的问题。这要看脚跟，看行动，看自己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到底跟着谁走，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一定要听党的话，步步跟着党前进。同时我对自己还有一个要求，即积极参加这场阶级斗争，在风浪中锻炼自己的阶级分辨能力，使自己的政治觉悟、阶级分子观点真正在斗争中得到提高（《日记》，5月9日条，本文作者收集）。

正是同一天，清华大学附中一位同学也在日记中第一次记录文化大革命：

当前，在国内，正面临着—场史前未有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一步地揭露以邓拓为首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行，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个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斗争。

目前的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这一小撮反党分子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为工具，猖狂地向党进攻。《北京日报》一再包庇它们，通过这几天的报纸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 and 认识，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他又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目前这场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个政治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学术问题。我们一定要加入这场斗争中去，去斗争邓拓，揭露邓拓，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作为一个革命的青年，我们有权利质问邓拓，我们有权利为保卫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而斗争。（《刘运通日记》，1966年5月9日条，本文作者收集）

为什么两位素不相干的中学生不约而同，都在5月9日的个人日记中第一次记录文化大革命呢？

早在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曾经以三个版面篇幅发表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和由彭真修改定稿的《前线》、《北京日报》按语，批判《前线》杂志和《北京晚报》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

所以《日记》中提到：“先前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丝毫不怀疑的，认为他们就是黑线的组成者”。

但两天后（即4月18日），《北京日报》的“三家村”和“燕山夜话”批判却成了“假批判，真包庇”、“制造混乱的措施”，作为关于彭真的材料发给了在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人员；会上彭真和北京市委受到严厉批评，会后彭真失去了自由；<sup>1</sup>会议还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sup>2</sup>接着，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彭真等人被集中揭发、批判，5月16日全体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通知》。但是，这些决策在严格保密环境下进行，公众并不了解上面发生了什么。

5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两篇文章第一次向全国公开披露4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正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从而“吹响了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进军号”。<sup>3</sup>

这对北京市发挥了巨大的文革动员作用。华北局第一书记、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6月23日回顾北京市的运动时，明确将5月8日到5月底看作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称“何明和高炬同志的文章出来以后，把批判‘三家村’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全市出现了一个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sup>4</sup>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也说，“5月8日高炬、何明的文章发表后，全市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兵一起，愤怒地展开了声讨、捣毁‘三家村’黑店的斗争，运动开始进入高潮。”<sup>5</sup>上面引用的两则日记，其实只是这“大好形势”或大潮流的点滴。

这样来看，《日记》和《刘运通日记》不约而同地在5月9日第一次记录文

<sup>1</sup> 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第1179-1181页。

<sup>2</sup>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sup>3</sup> 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编印《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文化方面犯下的滔天罪行》，1967年6月，第18页。

<sup>4</sup> 《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革命串联组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二）》，1966年11月，铅印，第24-28页。

<sup>5</sup> 《郭影秋关于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汇报要点》，1966年7月3日，<http://www.wyzsx.com/Article/Class14/201002/131169.html>。郭影秋谈过这份提纲的起草过程：1966年7月初，“华北局要在北京市召开华北局工作会议，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和黄志刚根据李雪峰一次讲话精神，先草拟了一个提纲，再由市委简报组起草成文，经过书记处会议讨论，最后由李雪峰、吴德定稿，而后让我在会上代表北京新市委发言，还用市委名义，以《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上报中央。”参见郭影秋口述、王俊义整理《往事漫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51页。

化大革命，表明文革走出中央核心决策层、进入普通民众视野正是通过何明和高炬的文章；至于《日记》作者和刘运通的反应为什么比文章刊发晚了一天，可以解释为他们只能读到前一天的《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所以，本文认为，5月9日，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北师大女附中的时间。

## 二、5月12日卞仲耘动员全校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在5月9日的日记中，《日记》作者决心“积极参加这场阶级斗争”，这还只是她个人的决心。但3天后，情况不同了。

5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全校做了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要求学校“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标志着北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卞书记动员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关系着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们党当前第一大事，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场斗争是看每个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试金石。

要求：

1、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认识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

2、以主席思想为武器，大家进一步揭发、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提高大家分辨香花、毒草的能力，提高大家学习主席思想的自觉性，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提高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提高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站稳党的立场。

方法：

边学习，边讨论，边揭发，边批判，边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思想认识水平。

文件：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解放军报》社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高炬的《向党

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姚文元的《评“三家村”》。

问题：

1、学习态度：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站稳立场，积极、主动、自觉、认真参加学习和批判；

2、当前斗争矛盾主要对准邓拓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要根据主席思想认真检查自己；

3、有意识锻炼考验自己，是否真的站在党的立场上，把无产阶级情怀投进去；

4、允许不同的意见都发表出来，对待不同的意见要说理，这场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

这场斗争是在搞阶级斗争，搞革命，大家应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与此联系起来，使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我们要把立场和斗争搞到底。它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的考验，从斗争中得到锻炼、改造、提高。（《罗治笔记》，感谢罗治老师同意使用这份笔记）

上述动员报告比“五一六通知”正式通过早4天，但并不是北京最早的全校文革动员。<sup>1</sup>

5月10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万邦儒校长已经在全校做过“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sup>2</sup>

再如，5月12日，西城区一所中学的领导周立人做“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要求全校“把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当作中心工作抓”，大家要“积极参加这个斗争，积极得到锻炼”，“在会上带头发言，联系实践思想，不走形式，在会下积极看报纸、互相谈论，带头写批判，同学有什么反映应积极反映，要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面，在讨论前把文章多看”。<sup>3</sup>

<sup>1</sup> 全市最早做全校文革动员的可能是中宣部子弟学校——北京景山学校，该校领导先后在4月26日、27日、5月3日、6日就“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做出安排。不过，该校动员以“教育革命”为中心，如5月3日陆鑫所做报告的题目为“高举毛泽东伟大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把我校教育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试验阶段”，这与本节谈及的其他动员报告有明显区别。参见《王瑞笔记》4月26日、27日、5月3日、6日条，本文作者收集。

<sup>2</sup> 卜伟华《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个问题》，载《记忆》58期，2010年9月30日。

<sup>3</sup> 引自本文作者收集的一册中学生笔记，但我不知道这是西城区的哪一所中学。

这三位中学领导人是否因为上级指示才在全校做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呢？

我们看一下上级机关所处的局势。

早在4月下旬，北京市委全体委员已经知道中央对彭真和“二月提纲”的态度。因为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给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送去了会上揭批彭真的简报。<sup>1</sup>刘仁4月21日收到材料后，于4月22日至26日，主持召开三届十次市委全体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材料。<sup>2</sup>此后，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不便”再公开露面，<sup>3</sup>但市委委员之外的工作人员还并不了解上面的情况。

5月8日高炬、何明的文章公开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引起市委机关极大震动”。11日，市委机关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短短的10天时间内，就贴出4000多张，形成大字报高潮，“以彭（真）、刘（仁）为首的反党黑帮分子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不少部委革命群众已经开始斗争黑帮分子。”<sup>4</sup>5月11日，华北局派出以李雪峰为首的工作组进入市委大楼，12日下午工作组和市委机关干部见面。<sup>5</sup>

照这样看，在6月9至12日，北京市委的日常工作已陷入停顿瘫痪状态，可能难以向基层发出指示；而派到北京市委的华北局工作组12日下午才与市委机关干部见面，也还来不及发指示。所以，万邦儒、卞仲耘和周立人关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校正式动员，可能是基层单位领导“积极、主动、自觉”响应中央号召的结果。考虑到李雪峰6月3日仍强调“群众一下子起来了”，各单位的领导还“来不及做报告”，<sup>6</sup>他们就同属全市较早对文化大革命号召做出积极响应的中学领导人。

这当然仅仅是推测。事情果然如此吗？在本文征求意见过程中，何蜀对上述

<sup>1</sup> 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521、571。

<sup>2</sup> 出处同上。

<sup>3</sup> 曹绮雯《魂系战友忆宋硕》，载《怀念宋硕同志》编写组《怀念宋硕同志》，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5页。

<sup>4</sup> 刘政等二十余人《北京饭店会议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1966年10月，电子版<http://wenku.baidu.com/view/7a63fcf8770bf78a6529544e.html>。

<sup>5</sup> 冯宝珠、刘祖培等《市委机关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年10月21日，油印本。

<sup>6</sup> 《李雪峰六月三日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革命串联组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二）》，1966年11月，第22-24页。

推测提出质疑：

作为一个学校的领导，要动员全体师生开展一场大的政治运动，若无上级的部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至于为什么在他们的报告中没有体现出有关情况，那只能说是或者记录者没有记，或者报告中没有讲到，但这并不能说明就是没有上级部署。而且，北京市委当时不管如何“瘫痪”，对中央的有关部署仍然会照样往下布置的。这是一种执政机器的惯性动作。决不是一瘫痪就什么事都不做了。所谓瘫痪是相对的，只是某些方面停摆了，但许多具体工作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按部就班进行。<sup>1</sup>

正如何蜀推断的那样，我在重读周立人“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笔记后，果然发现了关于市委部署的记录。在这份笔记中，周立人在动员报告中明确提到“市委号召我们立即行动”。<sup>2</sup>虽然笔记没有对“市委号召”做更具体的解释，但清楚地表明周立人的报告系响应市委“立即行动”号召所为。既然市委曾号召“立即行动”，卞书记和万校长的动员报告是否也应做如是观呢？当然，这也是推测。更明确的判断，需要收集更丰富的证据后才能做出（比如卞书记动员报告的其他版本，或者收集其他学校的文革动员报告笔记）。

在卞书记的动员报告中，提出了8篇文章作为主要学习文件，除4篇为毛泽东的旧作外，后4篇全是近10天报纸上的文章。这表明她和学生们一样，主要通过报纸了解文化大革命。这4篇文章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何明、高炬文章，还包括《解放军报》社论，这指的是5月4日，也就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那天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姚文元的《评“三家村”》，这是毛泽东支持、经上海市委讨论修改后，于5月10日由《文汇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这4篇文章刚好是5月12日前能公开读到的、最重要、最政治正确的文革文献。卞书记要而不繁地选取这4篇文章作为学习材料，表明她确实具备很高的政治水平，通过报纸已经准确把握当前政治动向。

相形之下，万校长的动员报告在政治正确方面似乎稍逊一筹，以致很快受到清华附中一些同学的批评。<sup>3</sup>而周立人报告指定的阅读文献，是高炬、何明文章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与卞书记指定的阅读文件也有差距。

<sup>1</sup> 2012年3月4日何蜀给范世涛的电子邮件。

<sup>2</sup> 佚名中学生笔记，本文作者收集，5月12日条。

<sup>3</sup> 卞伟华《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个问题》，载《记忆》58期，2010年9月30日。

### 三、5月14日后女附中按华北局统一部署“加强领导”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三所中学5月10至12日间的全校文革动员可能缘于北京市委曾“号召我们紧急行动”，但怎样“紧急行动”并不明确。因而三校动员报告的调子和指定阅读文件有不少出入。

这种情况只延续到了5月14日。在这一天，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在北京市高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上讲话，传达了已进驻北京市委的华北局工作组意见。此后，北京市各高校及其附属中学按照上级机关统一部署，都以“加强领导”、“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的模式开展运动。北师大女附中也是如此。

我们看一下宋硕报告的背景。5月12日以李雪峰为首的华北局工作组与原北京市委干部见面。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的宋硕曾对妻子说：“我意识到该轮到我了，躲也躲不过去。现在市委内有的人已不抓工作而去考虑交代自己的问题了。我是管大学党的工作的，我不能这样做，学校再这样搞下去就会出乱子。我想向华北局工作组汇报学校的情况和问题，让工作组抓一抓学校的工作。我向李琪同志（北京市委宣传部长，5月19日被免职——引者注）说了我的考虑，表示我一定坚持到底，决不临阵脱逃，得到李琪的同意。我向工作组做了汇报，工作组于5月14日召开了高校党委书记会议，开会时没人肯去讲话，临时由工作组指定我去会上传达华北局的指示精神，讲了运动要内外有别等。我强调各校党委要坚守岗位，加强领导，把运动引入正轨。”<sup>1</sup>也就是说，这次北京市高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是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机关后召开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宋硕在会上讲话系工作组临时指定，讲话内容系传达华北局的指示精神。

宋硕在讲话中说，“华北局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sup>2</sup>“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

<sup>1</sup> 曹绮雯《魂系战友忆宋硕》，载《怀念宋硕同志》编写组编《怀念宋硕同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

<sup>2</sup> 王效挺、孟容《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载陆钦仪主编《缅怀宋硕同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sup>1</sup>

北京各高校党委书记出席会议后，回去做了紧急传达。如陆平当天就在北京大学做了传达，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传达报告也应在当天或次日。

卞仲耘虽然没有出席市高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但作为北师大下属单位的总支书记，肯定参加了北师大传达宋硕报告的会议，<sup>2</sup>并做了详细笔记；然后根据笔记，又对学校各支部（包括学生党支部）做了传达。如女附中高三学生支部的刘进提到过，“1966年5月，宋硕有个报告，我们认为……”，<sup>3</sup>所谓“宋硕有个报告”，指的就是宋硕5月14日在北京市高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宋硕代表华北局要求各单位“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方式是“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卞书记在5月12日的全校动员后，按照上级要求没有再发表全校公开讲话；罗治并非学生党员，《罗治笔记》中也不再出现卞书记的讲话记录。

不过，女附中敏锐的学生党员已经注意到，宋硕报告所传达的意见与调门越来越高的主旋律存在明显落差。据刘进回忆：

1966年5月，宋硕有个报告，我们认为是压制革命的，和社论讲的精神不一样。党支部的老师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宋硕报告和66年上半年社论宣传精神有明显的区别，听完传达，学生党员议论纷纷，意见不少，我的意见也很大。老师照例用党纪要求不许外传。<sup>4</sup>

学生党员对宋硕的报告“议论纷纷，意见不少”，但北京市委和华北局工作组正忙于召开北京饭店会议，没有再向高校或中学发布怎样开展运动的具体指

<sup>1</sup> 转引自聂元梓等《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直接引语部分，1966年5月25日。

<sup>2</sup> 感谢卞伟华老师在3月中旬的一次电话中指出这一点。

<sup>3</sup> 冯敬兰、刘进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载《记忆》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sup>4</sup> 冯敬兰、刘进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载《记忆》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示；而女附中的老师也只好“照例用党纪要求不许外传”，学生党员们也照例从命。

其他单位也出现了类似意见，最著名的当然是北京大学。北大几位年轻人认为，北大党委陆平、彭珮云传达的宋硕报告，强调学校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遵守纪律等，实际是压制运动，运动方向违背了中央精神。他们决定从宋硕报告入手，批判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5月25日下午2点左右，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起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在北大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从而在全校公开了对宋硕和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关于运动部署的质疑。<sup>1</sup>

这张大字报轰动全校，并引来更多大字报。最初多为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很快维护校领导的大字报占了上风。几个小时后，陆平主持，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参加，召开了北大800人的党团员干部会；很快，新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征得康生同意，也应陈伯达之请到了北大，于是由刘仰峤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陪同，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党团干部会。<sup>2</sup>李在会上说，“不要开声讨会”，“不要提倡大字报”，“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贴了怎么办……有些人说通了，赞成撕，可以撕，不撕你可以贴上新的。”“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地打。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sup>3</sup>这些意见根据张彦传达的周恩来意见和康生等人意见提的。<sup>4</sup>虽然李并没有直接评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但基调与他们所批判的宋硕5.14讲话明显一致。次日，康生找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谈话时，说“李雪峰同志解决得好，内外有别嘛，这是原则。”北京市委“是否有修正主义代理人，要等中央文件出来再说，现在

<sup>1</sup> 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7月。

<sup>2</sup>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sup>3</sup> 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哲学系《灭资兴无》战斗队《李雪峰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是反革命的报告》，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革命串联组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二）：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辑》，1966年11月，第5-6页。

<sup>4</sup>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不能说。”“北大的隐患在后头，是要继续拥护宋硕大学部。”<sup>1</sup>也就是说，即使是康生，也认为在“五一六通知”未对外公布的情况下，应继续支持宋硕和大学工作部。

所以，虽然有人注意到宋硕报告与报刊舆论之间的落差，甚至在北大公开提出了质疑，但在6月1日前，全市教育系统的运动其实始终在宋硕报告传达的“加强领导”框架内进行。宋硕的5.14报告，其实是这一时期全市高校及其附属中学运动的指导性报告。

#### 四、5月27日一次声讨“三家村黑店”的班会

宋硕的报告要求各学校“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正是在这种部署下，北京的学生们完成了“积极、主动、自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情绪动员工作。从女附中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还是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女附中高三学生。她在5月23日的日记中说，在文化革命中“要当林彪同志所说的‘思想上过硬，生活过硬，技术过硬’的神枪手，枪枪打中靶心——三家村的大黑店”。

5月27日，她所在的班里召开了一次别开声面的声讨“三家村黑店”大会：

下午班上开了声讨以邓拓为首的三家村黑店的大会。黑板上的大字醒目而有力：

“向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

大家义愤填膺。句句质问，阵阵口号，却表达不尽对敌人对邓黑帮的恨，表达不尽对党对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爱。

许多同学用自己的血泪斑斑的历史驳斥了邓拓的所谓王道胜于霸道；用祖国欣欣向荣的现实驳斥了邓拓所谓党吹牛皮、说大话；用工农兵对主席著作的无比热爱驳斥了邓拓所谓党不堪信任、不得人心……有的同学气不过，甚至放声大骂邓黑帮，骂得开心，骂得解气！

文化大革命愈搞愈深入。近几天的报纸上工农兵除了指责、痛斥三家村黑店，同时一再声明三家村的老板并非邓拓一人，邓拓后面还有更大的老板，

<sup>1</sup> 郭影秋口述、王俊义整理《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更老的靠山。说得对！倘若仅仅邓拓之身，他是不敢这样疯狂之极的。其时间之久、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都不能达到开国以来如此罕见的地步。这个大靠山，是比邓拓更大的敌人，更老的修正主义，不斗倒他，非但三家村黑点砸不烂，而且中国还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想到这些，我恨不得一把揪出这个大坏蛋，让他暴露于铁打的江山面前，暴露于亿万人民群众的汪洋面前。

最近正在学习胡乔木同志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重温当时，再看现实，越发觉得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坚强伟大，我们的党从来都是在和党内机会主义和党外一切敌人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敢断言，邓拓的靠山正是今天党内的新机会主义，这个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搞到底，因为这是一场铲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根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告诉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今天来看毛主席的这段话，有血有肉。书生气十足的人，往往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敌人利用了的人，会在糊里糊涂中成为人民的敌人利用了的人，会在糊里糊涂中成为人民的敌人，我一定要步步紧跟党，坚决不当这种表面的书呆子，敌人的后备军。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评邓拓的“新编唐诗三百首”》的文章，给我敲起了警钟。万没想到，在不知不觉背唐诗的当儿，却有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摆在自己的面前！邓拓这帮家伙无孔不入，唐诗也被他们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谩骂毛主席的得意资本。

……

想用古诗作为传修正主义经的护身符，办不到！妄想！

在高三毕业班的课堂上，同学们“义愤填膺”，“句句质问，阵阵口号”，有的同学“甚至放声大骂”，“骂得开心，骂得解气！”这种场面与日后盛行的“批

判会”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把“三家村黑店”、“邓黑店”代换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刘邓陶”或别的人名、罪名就可以了；如果再加上对批斗对象的“面对面”体罚，就成了一场典型的“斗争会”（或“批斗会”）。

在这则日记中，作者相当熟练地使用了“猛烈开火！”、“指责”、“质问”、“驳斥”、“痛斥”、“谩骂”、“斗倒”、“砸烂”、“揪出”、“铲除”、“妄想”、“大坏蛋”、“黑线”、“黑帮”、“黑店”等有暴力色彩的词汇，并活学活用报刊文章批判套路对“新编唐诗三百首”大张挞伐。这表明报刊舆论鼓动和校方组织的政治学习，已经使她完成了“积极、主动、自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动员工作。

作者还注意到，“近几天的报纸上工农兵除了指责、痛斥三家村黑店，同时一再声明三家村的老板并非邓拓一人，邓拓后面还有更大的老板，更老的靠山”，认为“这个大靠山，是比邓拓更大的敌人，更老的修正主义，不斗倒他，非但三家村黑店砸不烂，而且中国还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想到这些，我恨不得一把揪出这个大坏蛋，让他暴露于铁打的江山面前，暴露于亿万人民群众的汪洋面前。”显然，她已经热切地希望将斗争的矛头从“三家村”转向“比邓拓更大的敌人”，其他北京市委领导的名字已经呼之欲出。

### 五、宋硕身份的变化和女附中运动开始转向

在卞书记领导女附中运动时期，女附中的学生虽然积极、自觉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批判矛头一直对准“三家村”；有的同学5月底已经准备将矛头转向“三家村”之外的“阶级敌人”，但到底转向谁尚不清楚。

但是，6月1日晚8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北师大女附中的运动矛头很快转向本校领导。

我们先看一下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情况。6月2日早晨，刘进听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特别激动”，随后“与宋彬彬、马德秀一起贴出了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题目大概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虽然矛头指向仍比较模糊，“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珮云的”，但这是女附中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转向本校，

因而格外引人注目。<sup>1</sup>

《日记》作者生动记录了大字报贴出后全校的反应：

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立刻，学校里动了起来，有人勇敢地贴出了揭发女附中校领导的大字报。万没想到，乌云滚滚而来，风雨压城城欲摧，学校召开党员紧急会议，镇压学生革命运动。顿时，学校内传来一阵歪风，大喊“一致对外”、“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四处游说，到处压人，扬言校领导是革命的，要保卫校党委。其欺骗程度之深，使得一部分同学哭哭啼啼撕下揭发校领导的大字报，并连带一篇“丧失立场，帮了敌人的忙”的深刻检讨。

看到这种情景，我气得要死，当我班班主任（共产党员）杨玉芝来班上游说时，我和她大吵一架。她理屈辞穷，只得连连担保，担保校长参加过几十年革命，是真革命，担保某某入党多少年，是好党员……真有意思，这一连串的“鉴定”竟当真迷惑了一部分人！……

下午，校内气氛很不正常，杨振（政治教员）唆使几十个同学在操场正中念“分清敌我，一致对敌”的语录，其用意不言而喻。<sup>2</sup>

一位女附中同学数十年后这样描述：“印象里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课间响了，然后就是夏青在播送一个社论，我的感觉好像战争发生了，立即心跳加速头皮发紧。下课后，就在校园里看见了大字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刘进，是你们写的大字报，打破了校园平静的空气。”<sup>3</sup>

一份文革出版物称：

6月2日，革命的闯将们贴出了一份份揭发前校党总支的大字报，刷出了一张张“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巨幅标语。<sup>4</sup>

这表明很多“革命闯将”继续第一张大字报的功课，参与到质疑和揭批校

<sup>1</sup> 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也谈卞仲耘之死》，载《记忆》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sup>2</sup> 《日记》1966年6月17日，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sup>3</sup> 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也谈卞仲耘之死》，载《记忆》2010年第10期。

<sup>4</sup> 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斩断邓小平伸向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黑手》，1967年4月15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f66f4b0102dvys.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f66f4b0102dvys.html)。

总支的队伍。《日记》作者也参与其中。

6月3日,《日记》作者与几位同学一起贴出了题为“怎样正确对待当前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的大字报,内容是“欢呼大字报,欢呼校内大革命”,“许多同学完全赞成,踊跃签名,当然胆小怕事的人沉默无语,缩到了群众运动的后面”。“高中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初中同学满操场乱转”。<sup>1</sup>

我们很容易设想,如果三位同学大字报在一两天前或更早的时候贴出,她们很容易被校方处理,也很难得到全校师生的同情和支持。而这时为什么三位同学打破了此前遵守的“组织纪律”约束,贴出了含有怀疑校领导内容的大字报?为什么大字报贴出后在全校产生一连串激烈反应?为什么“许多同学完全赞成,踊跃签名”“欢呼大字报,欢呼校内大革命”的大字报?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三位同学和“完全赞成”的“许多同学”,而在于中央公开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宋硕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不再是上级党组织的代言人,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

前文说过,宋硕5.14讲话系传达以李雪峰为首的华北局工作组意见,聂元梓在听陆平传达的宋硕讲话笔记也明确记有“华北局要求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字样。但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有意回避了宋硕讲话与华北局的关系,将其看作少数个人的“阴谋诡计”而进行逐条批评。<sup>2</sup>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公开支持这张大字报,也就同时公开认可了大字报将宋硕5.14讲话看作宋硕“阴谋诡计”的说法。事实上,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中,明确指认宋硕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5月14日讲话是“‘三家村’黑掌柜”邓拓被“揭露”后的“负隅顽抗”,“加强领导”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sup>3</sup>6月4日下午,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在与北京市委机关全体干部见面会上,也说“宋硕同志背着工作组进行活动,到5月14日还发指示,这就不好了。”<sup>4</sup>

宋硕从上级机关的领导同志变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5月14日讲话

<sup>1</sup> 出处同上。

<sup>2</sup> 王效挺、孟容《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载陆钦仪主编《缅怀宋硕同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sup>3</sup> 《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载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

<sup>4</sup> 冯宝珠、刘祖培等《市委机关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年10月21日,油印本。

成了“负隅顽抗”，“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这使按照宋硕5月14日讲话精神“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基层领导纷纷陷入困境。

作为女附中的主要领导，卞仲耘5月中旬听到宋硕报告的传达后，认真按照该讲话的部署领导本校运动：一方面向各个支部传达过宋硕的报告；一方面召开班会、小组会而不是全校大会声讨“三家村”。但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文广播后，校方不仅失去了将不同意见约束在有限范围的理由，而且此前不开大会的“加强领导”做法也成了最为可疑的地方。对校领导的质疑意见，高三某班班主任也只能用“连连担保，担保校长参加过几十年革命，是真革命，担保某某入党多少年，是好党员”来应对，这对同学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于是，校领导失去了权威，学校陷入混乱。就这样，运动矛头的转向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在6月2日至5日间，类似女附中的运动锋芒转向现象在北京到处都在发生。华北局第一书记、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讲过，“6月1日以后，形势迅速转变，北大的大字报一出，一批判黑帮、一批判前市委，一下子就联系到各学校，各单位的领导和工作，广大群众同各单位的领导就面对面接火了。”<sup>1</sup>他将各个单位的运动锋芒转向“单位的领导和工作”的原因，归结为“北大的大字报一出”，这当然是大概的说法。更准确地说，由于中央公开支持了北大的大字报，使认真贯彻落实宋硕传达的华北局精神，领导运动的基层干部，纷纷陷入困境。

## 六、6月4日第一个中学工作组来到女附中及运动的转向

上面谈到，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围绕校领导的不同评价，女附中分裂为不同的群体。一些人认为“校领导是革命的，要保卫校党委”，另一些人“欢呼大字报，欢呼校内大革命”，声援刘进等人，还有一些人在观望。既然她们不能取得一致，正常秩序也就难以维持下去了，全校陷入混乱。

不过，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两天，因为6月3日黄昏，团中央派人来到女附中，第一句话就是“师大女附中的革命形势好得很！”《日记》是这样写的：

谁能料到，（6月3日）黄昏大喜，团中央派人来我校了！团中央同志的

<sup>1</sup> 《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革命串联组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二）：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辑》，1966年11月，第25页。

第一句话即“师大女附中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话未落声，欢呼四起。两天来，校内一片“糟得很”的叫骂声，顿时被这一声犹如春雷般的响亮的“好得很”冲刷得一干二净。同学们跳着，哭着，因为这是对我们的最高评价。团中央的同志看了我们的大字报，并告诉我们，他们以后还要来，要天天来，来的人将会更多。

6月4日 谁能料到，昨天的那两位同志，竟是被派到我校的工作组成员！同学们高兴极了。校园内到处可以听到“毛主席派人来”的歌声，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派来了工作组”的标语。新的战斗即将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始。想到这些，彻夜难眠。（《日记》6月17日条）

这是文革中全北京、也许是全国第一个派到中学的工作组。它对女附中运动的含义，可以借用北京景山学校的工作组的话来解释：“前一段党支部领导没有、（领导）好坏，不要再争论。好就不会派工作队，党支部前一阶段没有能很好地领导。”<sup>1</sup>而工作组来后，“校园内到处可以听到‘毛主席派人来’的歌声，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派来了工作组’的标语。”这样的场面也表明，围绕校领导的争论不复存在，全校经过短暂的混乱，再次达成一致。甚至卞仲耘自己也赞成这样。她在一封给邓小平的信中“承认她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说学校运动六月十三日以前正常”，<sup>2</sup>换句话说，卞仲耘本人也认同了同学们对她的批评和质疑，并赞成工作组代替她来领导学校运动。12年后，中共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表扬了这一点，称卞仲耘同志“对党和群众始终坚持正确态度”。<sup>3</sup>

现在的人或许对团中央所派工作组以及卞仲耘本人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但放在当时背景下并不难理解：既然党中央已经以支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方式公开批判宋硕报告所要求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开小会”是“修正主义路线”，认真贯彻落实宋硕讲话要求的女附中领导当然也算做执行了“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团中央派来的中学工作组既无可能、也无力量与党中央唱对台戏。

<sup>1</sup> 《王瑞笔记》6月9日条，本文作者收集。

<sup>2</sup> 张世栋等整理《邓小平七月五日对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谈话》，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六盘山》1967年1月7日转抄，油印件。

<sup>3</sup>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8年6月3日，载《记忆》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而一旦工作组明确支持“校园大革命”，以卞仲耘为首的校总支也就正式退出了女附中运动的领导舞台。

女附中的经历在全市很有代表性。李雪峰说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开后，“许多单位领导瘫痪了，怎么办？只有派工作队。团中央把北京的中学包了，6月上旬大批工作组派到各个中学，并得到各校的热烈的欢迎。”<sup>1</sup>这意味着基层党组织领导文革阶段的正式谢幕，也标志着针对基层领导的运动矛头转向被正式确立下来了。

## 七、余论和小结

本文将女附中文革的正式开始界定为5月12日，标志是卞仲耘书记在全校做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这与以前的看法有所不同。

在一篇记录北师大女附中运动初期情况的经典文献中，作者说，“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另一位作者也有类似的看法。<sup>2</sup>

为什么她们都强调6月2日是女附中运动的开始呢？对这个问题，刘进和宋彬彬给出了解释。刘进认为，作为女附中初期文革的当事人和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对学校的事负有责任”。<sup>3</sup>宋彬彬说，“我逐渐认识到，尽管文革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具体到我们学校，这张大字报实际上起的是拉开学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参与写了，就应当承担起责任。”<sup>4</sup>她们显然将女附中第一张包含质疑校领导内容的大字报看作运动矛头指向校领导的原因，并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

既然文革史回忆文献普遍存在推卸和转嫁历史责任现象，她们勇于承担责任的意识显得非常珍贵。但问题在于，以6月2日为起点的说法难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为什么早在5月12日卞仲耘就在全校做了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为什么5月27日高三某班出现群情激愤的班会？为什么6月2日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对学校领导提出疑问？为什么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校方无法给出

<sup>1</sup> 《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革命串联组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二）：彻底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辑》，1966年11月，第25页。

<sup>2</sup> 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也谈卞仲耘之死》，载《记忆》2010年第10期；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载《记忆》第80期。

<sup>3</sup> 本刊特约记者《面对历史的责任——刘进访谈录》，载《记忆》第81期，2012年1月31日，第17页。

<sup>4</sup>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载《记忆》第81期，2012年1月31日，第15页。

满意的回答，许多学生热情声援？为什么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会支持第一张大字报？为什么卞仲耘自己也肯定了第一张大字报的怀疑，承认“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认为“学校运动六月十三日以前正常”？

本文认为，女附中运动的开始不能从6月2日说起；6月2日的意义在于学校运动矛头开始转向本校领导，开始转向的原因，在于校方此前认真贯彻落实了宋硕关于怎样开展运动的指示，而党中央却以支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方式公开批判了宋硕的指示，将宋硕定性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此前认真贯彻落实宋硕指示的校领导提出疑问和否定意见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我们说6月2日只是“矛头开始转向”，是想强调运动完全转向非三人大字报力所能及，团中央派来工作组肯定她们之后，运动矛头的转向才正式确立下来，而且全校师生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在本文最后，我们再简要回顾一下女附中文革的发动过程：

一、5月8日何明、高炬的文章公开披露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使文革走出中央核心决策层、进入普通民众视野。5月9日，文革渗透进了北师大女附中。

二、5月12日，女附中总支书记卞仲耘在全校做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要求学校“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标志着北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她之所以做这一动员报告，可能因为“市委号召我们立即行动”。是否如此，需要进一步考证。

三、5月14日后6月1日前，女附中根据北师大党委传达的宋硕5.14讲话所提要求，以“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的模式“加强领导”，安排全校认真揭批“三家村”。在班会为主揭批“三家村”的模式下，北师大女附中完成了“积极、主动、自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校动员。

四、6月1日晚，中央以公开支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方式对宋硕5.14讲话进行逐条批评，次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宋硕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5.14日讲话是“‘三家村’黑掌柜”邓拓被“揭露”后的“负隅顽抗”，“加强领导”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使原本对宋硕报告有议论的师大女附中同学公开贴出第一张怀疑校领导的大字报，而校领导确实一直认真落实宋硕5.14讲话，因而大字报迅速得到许多同

学的支持。学校陷入混乱，失去了正常秩序。

五、6月4日，北京市、甚至全国第一个工作组来女附中，并宣布支持同学们质疑校领导的意见。卞仲耘书记自己也认为，自己“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于是，全校再次达成一致，并恢复秩序。

上述过程其实适用于全北京市的教育系统。由于宋硕的5.14报告其实代表了以李雪峰为首的华北局工作组对全市文革运动的意见，6月1日前北京各所学校都在该报告的框架内进行。6月1日至2日，中央以公开赞扬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方式对宋硕及其5.14报告进行严厉批判后，各所学校都迅速出现质疑认真落实5.14报告的本校领导的大字报。为了应对各所学校的混乱，工作组迅速派出，这意味着全市的运动矛头从“三家村”正式转向各单位的领导。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毛泽东6月1日决定广播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从根本上改变了宋硕的身份和5.14报告的性质。这使认真落实宋硕5.14报告的基层干部陷入“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困境。于是，运动的转向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至于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情况，就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2012年3月2日初稿

2012年3月25日定稿

## 【评论】

## 遇罗克的罪名到底是什么？

## ——追踪遇罗克之死

阿 陀

《今天》文学杂志 2010 年冬季号刊登了北京四中几篇有关遇罗克的回忆：

《昨夜星辰昨夜风》——当年“鬼见愁”对联谱曲者，<sup>1</sup>“老兵”刘辉宣在文章里说，虽然“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但罗克之死实际是因为文革前发表了反对《海瑞罢官》的文章。反文革。

《似水流年》——当年发表《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主编牟志京这篇新作，重复了 20 年前在《〈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一文中提出、后被广泛引用的提法：记得判决书的主要罪名“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认为这是当局把弟弟罗文私藏的一颗手榴弹归结为哥哥，是欲加之罪，是陷害。

《往事岂堪容易想》——《中学文革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李宝臣倾向牟志京的说法，阐述更为具体。他认为 1967 年 4 月 14 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态说《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已经注定罗克被重处的命运，但当时回避通过《出身论》下手。<sup>2</sup>等了将近三年，终于栽了一个刑事犯罪的罪名。

读罢上述文字，我的好奇心上来了：罗克到底是不是因为私藏手榴弹，阴谋暗杀毛的“刑事罪”被送上断头台的？刚巧遇到一位北京朋友，他正是遇罗克弟弟遇罗文的好友，于是问题便直接拨给罗文。

## 一、罗文断然否认“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说

罗文热情直爽，虽初交，并不回避我提出的任何问题。

他说：刘辉宣没有必要往自己身上扯，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是《鬼见愁》作曲者。不光他，像姚文元、戚本禹，也都是过眼烟云的小人物啦，利用一下而已。路线是主要的，个人随时都可以被牺牲掉。

<sup>1</sup> 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sup>2</sup> 1968 年判遇罗克 15 年，他不肯签字。

至于“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条。如果有，那可是要命的死罪，作为亲人不可能印象不深，要为罗克脱罪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

他说罗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知道弟弟从东北带回手榴弹。当局审讯罗文时也百般逼他交代遇罗克和手榴弹的关系，他当然一口咬定哥哥罗克和此事无关。也就是因为这样，定罪时才没有这么说。再说杀毛有这么容易吗？就一个手榴弹？你能靠近他？罗文反感一些人老拿“手榴弹事件”说事。

“那么当时的判决书你们没有保存？就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留下来？”我问。

“根本没有判决书！”罗文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按常理应该发给家属判决书，何况牟志京的回忆也提到判决书。但罗文一口否认。他说，他和家人是通过满大街的布告才知道罗克被判了死罪，他家没有任何人接到过判决书<sup>1</sup>。

罗文说，当时布告上登出来判死刑的一共有十多二十人。其中罗克的罪名是书写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和预谋暗杀。

“预谋暗杀？没说杀谁”？我问。

“没有！如果明说暗杀毛泽东，我当然立刻反应，最要命一条啊！我们都没往那方面想，你真想杀，也得有条件，无从说起。哪怕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倒是另一件事当时让我猜想过：1967年我哥曾策划想打一小流氓，因为这人曾和我哥在同一待业学习班，后来又分到同一工厂。可能两人聊天说的一些话，被这人向厂里检举了。这人不过是白丁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我哥也不可能和他有什么深谈。但他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靠拢组织？想立功？什么‘上山打游击’，‘武装暴动’……胡编一气。当时厂里还把我哥关起来审查。如果《出身论》被点名以后，他再继续瞎说，对我哥会造成很大威胁，可能会被判刑。因此我们想警告他。但这事结果没有做成。现在罪行里有暗杀一条，会不会是这个人？……”

如果罗克记忆无误，一份当局公布于众，性质几乎等同判决书的死刑布告，怎么可能在判罪的关键语言上含糊不清，甚至连语法都不通？我大吃“二惊”。

两种说法完全不同：一个是挚友之言之凿凿记忆，简单明晰；一个是兄弟刻骨铭心的往事，合情合理。我该相信谁？

<sup>1</sup> 笔者后来注意到这并非孤例。南京另一位文革思想者查全华 1969 年被公审后处死，家属也称从未收到判决书。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提到：“顾文选在 1969 年 3 月 5 日被枪毙。笔者未能找到他的判决书。实际上，据笔者的调查，在文革中判刑，被判刑的人以及家属都没有收到判决书”。（103 页）

罗文说，当然相信我！这是我家的事，没有人比我们更关心，更认真了。

我心里想，40年前经历的一件事，谁能保证自己记忆百分之百准确？至少得有旁证，但最可靠的还是文字证据。两种说法我只能都姑且存疑，还有没有其他说法？先做做功课。

## 二、遇罗克是否被定“杀毛罪”

“维基百科”遇罗克条目，介绍被判死刑的主要原因——

表面原因：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来源于判决书）。

主流印象是：遇罗克因《出身论》一文，为当权者所不容。

另一种观点：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发表在《文汇报》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百度百科——

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记载，<sup>1</sup>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1999年1月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是最早最全面收集整理罗克遗作和相关回忆评论文章并公开发行的权威著作，<sup>2</sup>于是人们只要一谈到遇罗克的死因，几乎无不以此书为据。然而我把书从头到尾再细读一遍，发现“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仅出自牟志京和宋永毅两位作者。宋只是在“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一文结尾提到罗克死于“企图暗杀毛主席”罪名，并未注明出处。笔者电话访问宋先生，证明也是出自牟。那么，牟又出自什么？出自“我记得在其死刑的判决书里，其死刑的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出身论》只字未提。”

<sup>1</sup> 徐晓、丁冬、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sup>2</sup> 以后似乎少有有分量的新文章出现。

——牟见到的肯定是一份判决书？还是布告，通知，或其它？既然有“主要罪名”，那么应该还有其他“次要罪名”，牟没交代，看来数罪中“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主要罪名”，即杀毛罪，其余都记不清了。在这样情况下，将某人久远年代留下的片段记忆等同“判决书”，人人引用，岂不儿戏？

该文中牟详细介绍了他所知道的罗文“私藏手榴弹”的前后经过，并且还尖刻批评罗文的鲁莽行为是“愚钝异常”，而当局最终将“罗文的手榴弹”嫁祸于罗克，则是“懦弱的陷害”。但到了大名鼎鼎的“维基百科”引用者那里，却变成罗克本人“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还特别注明“来源于判决书”（牟记忆中的“判决书”）。“百度百科”更离谱，无中生有造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完全没有的内容，编了一套遇罗克本人亲自私带私藏私埋手榴弹甚至还被盯上的具体情节，竟被很多网民引用。M旗帜网站“乌有之乡”转贴了石宁“遇罗克、张志新案真相”一文，兹摘录如下：

“遇罗克谈不上什么‘被害’，遇罗克在文革中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主席。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也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遇罗克暗杀毛主席并非空穴来风，手榴弹就是物证。文革武斗分子也有手榴弹，但那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性质完全不同。有人说遇罗克的言论惹了大祸，这是对的。遇罗克的反革命言论直接改变了手榴弹这个物证的性质。”

这段文字前半部和上述“百度百科”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会不会石宁就是始作俑者？<sup>1</sup>石宁也交代是出自同一来源——徐晓、丁冬、徐友渔主编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世间竟有这样偷天换日，无中生有和公然造假的荒唐事？

总算让孤陋寡闻之鄙人大开眼界，也知道原来网上的“百科全书”和我们传统概念中的权威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之类完全是两码事，参考可以，轻信不可。

仅仅是一个人的片段记忆，不要说没有真正的白纸黑字的判决书可以佐证，哪怕是起码的其他人的回忆旁证都找不到一个，怎么可以轻率地作为历史的凭证

<sup>1</sup> 无论维基还是百度，都不会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仅仅是资料的转录登载者而已。

断然相信？何况，关于遇罗克的“死罪”，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回忆版本，也出自官方出版社，可偏偏就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 三、罗文一直认为罗克并非死于“刑事罪”

就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出版的第二年（2000年），罗文的长篇回忆录《我家》也相继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第206页提到：

“1970年3月5日，罗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一、书写的10万字的反动文章；二、在狱中气焰嚣张；三、扬言阴谋暗杀。”

按照罗文的回忆，当年判处罗克的主要罪名就是“书写反动文章”，实际上隐含的就主要是指《出身论》，至于其余两条，只是含混不清的附加罪名而已。

牟志京说罗克死于“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名，遇罗文说死因是“书写反动文章”，回忆同一件事，结论完全不同，而人们一般都愿相信前者，无视后者。

这是为什么？

罗文的回答：无论是牟志京、蒯大富或是其他许多人，他们还是不了解共产党的本质，不相信当局怎么可能因为一篇反血统论的《出身论》就明目张胆把罗克杀掉。其他人不也反血统论吗？也没怎么样啊？所以他们认为一定还有其他原因，至少也要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牟志京因为知道“手榴弹事件”前前后后，并且自己也被当局追问过遇罗克和手榴弹的关系，判罪中有暗杀这一条，他很自然会往这方面联想，认为当局是以此为借口惩罚罗克。于是可能就变成了记忆中的“判决书”的主要罪名“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另也有人解读这一条时带有美化当权者的心理——看，老毛杀你也不是无缘无故，也是情有可原的嘛，至少行动上你还犯了错误，授人以柄。这种说法往往被拥毛派利用。其实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也还是没有觉悟，他们不明白《出身论》的分量有多重。血统论是当时共产党统治的阶级基础，罗克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底线，这是不能容忍的。当局当然想在手榴弹上做文章，如果可能的话，但实际上做不到，因为罗克确实没有参与任何行动，只是知道我藏有手榴弹而已，他不承认知道，我当然更不会说，



我们之间有默契。当局也没有办法，<sup>1</sup>但当局还是把他杀了，主要罪名就是“书写反动文章”，当时他们就敢这么做，杀鸡儆猴。“一打三反”以言论治罪，就是由这个时候开始的。

#### 四、 质疑罗文，为求真相

罗克无疑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罗文的回忆和分析也不无道理，但对于历史真相而言，不断用怀疑的态度去设问推敲，用求实的态度去寻找证据加以检验，才是对当事人，对历史最大的尊重。

罗文所言有两处值得商榷：

首先是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和我谈的判罗克的三条罪名，这和后来我读到他本人十年前写在《我家》的三条有出入：

《我家》——书写的10万字的反动文章；在狱中气焰嚣张；扬言阴谋暗杀。  
电话——书写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和预谋暗杀。

两相对照，“书写反动文章”这条主要罪名前后记忆一致；中间一条不同；最后一条都提到没有实行，没有对象的暗杀罪，但用语不同。

我第二次致电罗文，问到底是“扬言”还是“预谋”？若是前者，是不是当局掌握了什么言论？罗文坦言，他只是记得大意，街上的布告，当时那种气氛下，作为家属那敢当街慢慢细看，还要靠不断有朋友过来转述，讨论分析。他也不可能把每个用词都记得那么准确。

另一处是罗文电话里说没有判决书，然而随后我发现，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收录的遇罗锦1981年写的“乾坤特重我头轻”一文里，载录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的编号“(七九)中刑监字第一三一〇号”的“刑事再审判判决书”，该再审判判决书宣布，撤销原来判遇罗克死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〇)刑字第三〇号判决书”。

显然，判决书是有的，编在“(七〇)刑字第三〇号”。罗文说没有，准确说，应该是他和他的家人从来都没收到，甚至也没见到过这样一份按理应该交给受刑人家属的判决书。

由上可见，任何当事人的回忆，无论是牟志京还是遇罗文，都不是百分之百

<sup>1</sup> 私下里罗克是反对暗杀毛的，他曾经对我说过，你就是和他同归于尽都不值得。罗文，长篇回忆录《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

可信的，只能作为参考，绝对不可以轻易单独作为证据随便引用，最好是有物证。在遇罗克一案中，最最关键的文字证据，就是“（七〇）刑字第三〇号”判决书。

### 五、关于“（七〇）刑字第三〇号”判决书

首先将另一份相关判决书原文引用如下：<sup>1</sup>

#### （七九）中刑监字第一三一〇号刑事再审判判决书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一九六八年一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8年11月1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〇）刑字第三〇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注意这里明确提到遇罗克前后被判了两次死刑：第一次是1968年1月，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但没立即执行，也没任何判决书；第二次是1970年再判死刑并且执行。这份1979年为其平反的“再审判判决书”提到了1970年行刑前有一份“（七〇）刑字第三〇号判决书”，却不提其中任何内容。“再审判判决书”，从行文顺序和字意，“纠正”的具体对象只是1968年那个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原判”（看来更像没有判决书最后也没有执行的简单的判决令），但紧接着下文“撤销”的却是1970年另一个实际执行了但现在却不著一字交代内容的“（七〇）刑字第三〇号判决书”。

那么，“（七〇）刑字第三〇号判决书”具体内容是什么？

有三种可能：1、沿用1968年原判笼统提到的“现行反革命”罪；2、是牟

<sup>1</sup> 徐晓、丁冬、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9年。

志京回忆的焦点明确的“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3、是罗文所说的面面俱到却又语焉不详的三条<sup>1</sup>。

证据！证据？

## 六、最新发现文件证实：罗克死于思想言论罪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网上发现四川文革史研究者王锐去年公开披露的一份珍贵的档案文件，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已经决定枪毙包括遇罗克在内的20名“现行反革命”，并把他们关进“死刑号”以后，于1970年1月9日发到北京各级基层政权组织制造舆论的“通知”。

<sup>2</sup>

这份通知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一个简短的类似前言的正文，大意是：当局准备最近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此之前，先把他们的犯罪事实材料印发出来，以便“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后，“提出处理意见”。“通知”的最主要内容还是附后的各人“犯罪事实材料”。其中关于遇罗克的一段兹录如下：

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这份材料和罗文的回忆惊人地吻合——1、主要罪行是反动言论文章；2、提到网罗反坏分子<sup>3</sup>和气焰嚣张；3、所谓“阴谋暗杀”果然是含糊其辞，没有对象。

作者还把“通知”文本拍照公布，看来是真实可信的。这份原定“只供内部

<sup>1</sup> 反动文章，反动气焰和扬言暗杀。罗文，《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

<sup>2</sup> 王锐，《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为遇罗克遇难40周年而作》，《北京之春》，2010年9月号。

<sup>3</sup> 罗文：组织反革命集团。罗文的长篇回忆录《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

讨论，不准张贴”的内部文件，和街头公开张贴的“公告”以及平反时提到的第30号“判决书”，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可资对比的证据证明三者就是同一个东西，但即使形式上还有不同，其内容也不大可能超出这个“通知”的范围，因为距离1月27日枪毙日期如此之近。1月9号到27号之间，铅印发出“只供内部讨论”的“通知”几乎同时，街头上已出现看来是同一内容的布告。<sup>1</sup>

1月27日“通知”名单上19人执行了死刑，唯罗克的死刑因故推迟执行。之后，2月11号当局曾再发另外55人“罪行材料”的第二份“通知”<sup>2</sup>，王锐2010年最新收集到的这后一份“通知”更证实了前一份“通知”的真实性。<sup>3</sup>包括遇罗克等19名于3月5号被执行枪决者都在第二份“通知”的名单内。这份原始文本上有许多决策者批改的笔迹，例如遇罗克在前一“通知”的序位是10，在第二份原来没有遇罗克名字的“通知”里，决策者在第5序位用笔加插进遇罗克的名字，意即把原计划上一批枪决但没执行的犯人补进这一批，排位提前，但决策者没有像对其他部分的人那样，在遇罗克名字旁加注，修改或补充犯罪内容，所以罗克的“犯罪材料”应该还是沿用依据前一“通知”。

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发到北京各级基层政权组织的“通知”，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发现的能证明文革当局主要是以思想言论罪而非刑事罪判处遇罗克死刑的关键证据。

### 七、所谓“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说不能成立

回到本文开头，牟志京最近发表的在原作《〈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基础上补充改写的新作《似水流年》，重复20年前的提法，略有不同的是，原作“我记得在其死刑的判决书里，其死刑的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在改为“在判决书上，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新作删去“我记得”三个字，因此语气更为肯定。新作还补充一段文字，提到1月9日列有二十几名死刑犯的“公告”。在牟志京新的表述中“判决书”和“公告”好像应该

<sup>1</sup> 根据罗文的回忆，1月中旬他和罗锦不约而同从农村都回到北京，事先并不知道会碰上这次宣判，看到大街上贴的布告，都大吃一惊。街道和派出所见他们这时候突然回来，也大为紧张，在27日以前已把他们驱赶回农村。他现在回忆当时所看到的布告，证明在时间和内容上都和“通知”一致。

<sup>2</sup> 王锐《遇罗克被害内情再探讨》，《北京之春》2011年3月号。

<sup>3</sup>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版 第100页

是两份不同的文本，如果牟关于“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记忆真是从“判决书”来的，那么是否要问，连家属都看不到的这份神秘的“(七〇)刑字第三〇号判决书”，你怎么看到的？如果牟的记忆和罗文的记忆其实是同一来源——街头公告(布告)，那么王锐先生发掘出来的这份应该是街头公告底版的“通知”，已经说明了一切。

“通知”里完全没有手榴弹杀毛的提法，甚至连暗示都没有。“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非常泛泛的控罪。“手榴弹事件”从事实到逻辑推理都很难入罪，那么“暗杀”一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都应该知道，当时任何人在政治上若被人检举诬告，如果不能用事实证据推翻，即不能证明你无罪，你就是被假定有罪的，成“嫌疑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假定的罪名，莫须有的东西，最后都很可能成为拼凑入罪的一部分。“手榴弹事件”是一个具体的过程，罗克与此有无关系，是完全可以查清的。不要说此事和罗克无关，退一步说，就算有关，文革武斗期间大量武器流落民间，个人藏有武器也很平常，一般不构成什么大罪，但如果有人诬告罗克有“阴谋暗杀伟大领袖”的言论，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再联系到私藏武器，就可以把罪名无限扩大。罗克的罪行材料提到“阴谋暗杀”，有可能就是出自某人检举。除了上文提到的罗克早就担心一个原来的同事乱咬，在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一文引用的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存档的一份当年有关记录，<sup>1</sup>也可以证实这种“担心”：

9月17日

问：哪一个敢暗害伟大领袖……

答：这是没有的事。

问：你对伟大领袖、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仇恨？

答：我没有。

……我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

……

<sup>1</sup> 预审员审讯记录：见徐晓、丁冬、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9年版 第359页

## 八、罗克死于“思想言论罪”的背景

关于遇罗克死因的论述，文革后至今三十多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年代）“恶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两罪并罚，

1980年代，“遇罗克事件”被报刊披露后，较权威的提法出自1986年严家其《中国“文革”十年史》：1967年4月14日由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面讲话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公开宣判了《出身论》死刑。

.....

1968年，遇罗克被冠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而遭逮捕，经过多次批斗、公审，于1970年3月5日被处决。<sup>1</sup>

随后，1989年金春明等人编著《“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一书中的“《出身论》事件”条目中，基本照搬上述提法。<sup>2</sup>

第二阶段：（1990年代末至今）“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成主要罪名

1999年徐晓等编著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由官方出版社出版，当事人牟志京的一句“记得判决书的主要罪名‘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成了后来广为引用的新权威说法。这以后，不但早前严家其提到的两条罪名渐被忽略，就是后来2000年罗文回忆录三条罪名的提法，也没引起注意。

第三阶段：2010年《通知》被发现，现在可以确认罗克主要死于“思想言论罪”。

根据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材料看，在罗克之前，1966年中至1970年初这段文革期间，因为权力更迭，公检法部分瘫痪等原因，不同时期各级权力当局以“反革命罪”直接公开判处死刑的人数并不多，有也多半是“现行罪”或有攻击性言论的“恶攻罪”。1968年1月逮捕遇罗克后，从当局审讯记录看，开始也是千方百计想在这两个方面入手，追查有组织活动及反动言论。<sup>3</sup>但罗克在行为上没有什么把柄可抓，言语上没有什么激烈的攻击性语句口号，文章更是思辨说理，还尽量使用体制的语言。当时文革群众运动虽然已经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期，还未正式进入“收”的阶段，罗克在全国已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当局可能不愿意直接

<sup>1</sup> 严家其、高皋《中国“文革”十年史》第115、116页，香港大公报社1986年11月出版。

<sup>2</sup> 金春明等《“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是出版社，1989年7月。

<sup>3</sup> 追查有组织活动及反动言论。预审员审讯记录：见徐晓、丁冬、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9年版 第352至359页

以思想言论入罪，所以有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定调“反动文章”在先，拘捕罪名却是含糊不清的现行罪。在罪证不足的情况下，被捕不到一个月内，由初判15年，莫名其妙突然匆匆改判死刑，又不明原因突然停止执行，这反映了此阶段当局还举棋不定有所顾忌。但两年以后形势不同了，当局就敢公开以思想言论入罪判死并执行。

1970年，第二次判处罗克死刑时，当局公布详细罪行是：“1963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归纳或可简单称之为“三加一”罪，即思想言论罪、反革命集团罪、阴谋暗杀罪加上“气焰嚣张”，这基本和罗文的提法吻合，也包含了牟志京和李宝臣等人不同角度的阐述。但这样虽然面面俱到，却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进一步分析，这段文字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是历数“思想言论罪”，特别是既有时间也有具体所指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明显就是指发表在“中学文革报”“印发全国各地”的《出身论》和其它相关文章，这恰恰是遇罗克一向“思想反动透顶”的发展和归结，是判罪的核心依据，这是实的。至于后面的“还……”则是虚的。有“网罗反坏分子”之说，却没有坐实“组织反革命集团”；有“阴谋进行暗杀活动”之指控，却完全不提具体对象；甚至连坚持不认罪的“气焰嚣张”也成了非罪之罪。

如果说，1968年第一次逮捕和速判罗克死刑时，文革当局还极力把罪名往刑事罪上靠，那么到1970年第二次判处死刑时，洋洋洒洒的罪名罗列中，思想言论罪已堂而皇之列为首位，刑事指控则成了含糊其辞的陪衬。

无须赘言，以思想言论罪对罗克处以极刑并在“九大”后执行，表明权力当局左右两派最终达成共识，罗克之死也是《出身论》之死，“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文革高潮中一度模糊的“阶级路线”重新得到确认和贯彻。当局借口因为战备需要全面展开的“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实际上也是对文革初期有限度开放言论时冒出来的异端思潮实施全面报复，文革造反者从一开始就挥之不去的梦

魔终于成为事实，罗克等可以说是首批杀鸡儆猴的牺牲。新一轮大清算——“一打三反”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1970年1月9日，遇罗克等20人被拟判死刑的《通知》发出。其中“包括遇罗克在内的9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犯罪’。即其仅仅是按自身所思所想，写了为当局所不容的文章、书信、日记等，以此获罪并遭极刑”<sup>1</sup>。

1月27日，除遇罗克外的其余19人被执行死刑。“成了还没有正式开展但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奉命率先行动的那场‘一打三反’运动的第一批受难者”（王锐）。<sup>2</sup>

1月31日，“一打三反”第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发出。其中第五项内容，将对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处决权，从中央（原最高人民法院）重新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自此杀戒大开。

3月5日，北京市的第二批死刑犯也是19人被送上刑场，其中除了遇罗克外，还包括另一位“文革思想者”北京钢铁学院教师郭昌明及右派分子“北大才子”顾文选等。

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城乡迅速展开，成为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以思想言论入罪，判刑杀人最多的一场运动。

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通史《大动乱的年代》，作者王年一披露了从中央文件亲手抄下来的“一打三反”统计数字，其中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著名学者丁抒在《风雨如磐的岁月——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一文中认为：“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10万以上”。丁抒指出：“‘一打三反’与1968至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前者的打击重点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产物，自从中共上台清算‘历史反革命’开始，‘现行反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以思想言论定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中共建国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

<sup>1</sup> 王锐：《遇罗克被害内情再探讨》，《北京之春》2011年3月号

<sup>2</sup> 王锐：《遇罗克被害内情再探讨》，《北京之春》2011年3月号



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 后 记

“造反有理”是文革最著名的口号。

没有党中央关于开展文革，矛头向上的“5.16通知”，没有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号召，没有最高领袖八次接见一再鼓动，“造反”怎可能“有理”？

结果，两年多的“造反有理”群众运动，两年多的有限言论自由，换来了十年不止的清算和镇压。

造反有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三种人”，正是这五场运动，构成了另一部真实的文革历史。

文革造反者，何曾须臾忘记过1957年的前车之鉴——“秋后算账”？

什么是文革？

文革就是：造反有理——秋后算账！

文革是造反者的历史宿命。

——读出这段历史画面，仰天长叹，唏嘘不已！

壮哉罗克！

2011年5月1日（遇罗克69周年诞辰日）初稿

2011年10月8日定稿

于芝加哥

## 【评论】

## 一代人的悲哀与责任

## ——读《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匡卫群

(原师大女附中73届高中毕业生)

2007年我参加校庆，因“评选风波”，才知道“八五事件”。去年，我以卞仲耘之死为素材，写了小说《食指》，发在班级网站和我的博客里。自那以来，我一直关注宋彬彬校友，希望了解她对“八五事件”的反思。接到《记忆》80期后，看到上面刊登了宋彬彬校友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我认真读了。该文第二部分内容与冯敬兰、叶维丽等校友写的访谈录基本相同；第三部分所述参选“名誉校友”一事，内中曲直我原来不知，看后才有所了解。总的感觉，文章重在澄清事实，反思则较弱。澄清事实确属必要，但我等后届校友，估计大都看过访谈录，亦看过王友琴等校友的文章，对“八五事件”自会各有判断；而我更想看到的，是宋彬彬校友对事件的反思，以便深入探本穷源。

当“八五”暴行在酷暑的夕阳中定格，它便注定成为相关者的梦魇。虽然在恐怖八月，仲耘之死并非个案，但其他死魂灵似乎都能安眠地下，唯独二龙路的冤魂不入黄泉，久在人间徘徊，甚至几十年后，还闹得四海沸扬。究其原因，就在于“要武嘛”三字。天安门上戴袖章，圣旨“要武嘛”布告天下，从此“宋要武”的恶名世人皆知。人一旦成名，褒贬由人，百口莫辩，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八五事件”也伴随“宋要武”传播天下，成了母校难以愈合的伤口。文革后拨乱反正，因“为尊者讳”，故“宜粗不宜细”，许多冤案只平了反，对直接责任人没有认真追究。如今四十多年过去，物逝人非，再想弄清真相，追究责任，哪里去找铁定的证据？往事如烟，回忆难免有疏漏舛误，或时间倒错，或张冠李戴，证真证伪都难定讫。所以，消除“妖魔化”，需要澄清事实，但救赎之道，我以为还在深入反思。

宋彬彬在文中向“八五事件”中不幸去世的卞仲耘校长表示最深切的悼念，向她的家人和所有“八五事件”中受害的校领导及其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可钦可敬。文革初期，京城一些干部子弟带头造反，点了文革第一把火；其中

不少人殴打师长，虐待“黑五类”同学，开暴行之先河，污水在校园整整流淌了十年。我们在校时，赶上批“右倾回潮”。我们虽没打老师，但铺天盖地给老师贴大字报，那精神摧残亦属暴行。2007年校庆时，我在班网写母校回忆，里面提到批右倾回潮时，自己鼓动同学，给教英语的刘老师贴大字报。校庆聚会那天，有女生告诉我，刘老师有个智障儿子，那会儿她每天忙完学校的事，就赶回家照顾儿子，我当时呆了。自己也为人父，知道孩子残疾对父母是多大的精神压力，刘老师在承受家庭压力之时，还要承受我们对她无端的指责，那是多么残忍的折磨！再回想1966年，我上小学，音乐老师是位老先生，有哮喘病，因“历史问题”被打成牛鬼蛇神。寒冬里，我们强迫他为每个教室的煤炉拢火。他被煤烟熏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如今想来，恨不得抽自己嘴巴！难道我们不该诚心诚意向他们道歉吗？忏悔和道歉，是我们这代人净化心灵的第一步！

宋彬彬校友提到“八五事件”是“阶级斗争教育”的产物。我想，说“残忍教育”大概更能准确反映其实质。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矛盾，存在斗争，这是客观事实。但解决矛盾必须在宪法框架内，必须用和平方式，不能以人治代替法制，更不能宣扬暴力，鼓励残忍。“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对敌人要像寒风一样冷酷无情”；“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对此耳熟能详。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受到的教育与其差之千里。残忍教育之外，还有造神教育和妖魔化教育。造神教育不用多说，妖魔化教育，是指任意将共和国公民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进行丑化宣传。造神教育使我们愚忠，妖魔化教育使我们仇恨，残忍教育使我们野蛮；愚忠者易受蛊惑，仇恨者抛弃怜悯，野蛮者丧失人性。“八五事件”的发生，这些教育可说是始作俑者。

有人说红卫兵也是老师教出来的，老师没教好学生，老师也有错。我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学校教育只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马克思说现阶段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的本质。为何红卫兵发起者多是干部子弟？这和干部子弟的家庭背景及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有些干部子弟，近水楼台，先闻风声，未明真相，率先造反。孰知批来斗去，发现文革要造的是自己老子的反，遂掉头反对中央文革，联动西纠，皆入班房，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幸好我们这代人中，还有遇罗克那样的智者，勇于独立思考，不恤割喉拔

舌而坚持真理；还有母校老三届学姐们那样的醒悟者，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塑校长铜像于校园，如鲁迅所说，“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

校庆“评选风波”涉及对宋彬彬的评价。宋彬彬文革初给校领导贴大字报，对学校的运动起了发端作用；“8.18”给毛戴袖章，对全国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些的确需要本人警醒和反思，但由此推论她要为“八五事件”负责，则有失公允。1968年后她人生坎坷，能发愤读书，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成为地球和大气物理系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博士，精神可嘉；她对1966年夏季的所作所为做出道歉，并进行了反思，也为后届校友做出了榜样。因此我觉得她入选荣誉校友是可以的，只可惜她这篇文章来得较迟，若能在校庆前发表，我想争论会少些。我不以为然的，是校庆用了那张她给毛戴袖章的照片。既然她已事先声明不能用，学校为何还要选用？不单印入纪念册，还竖立于大会堂，陈列于校园，致使舆论大哗。30年前，《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已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0年后，校庆纪念册还将标志这场内乱发端的“8.18”照片，与受害人卞仲耘的照片印在一起，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此事再一次印证了彻底否定文革与深入反思文革之重要，这种深入反思需要我们的不懈努力，只有让世人看清历史的真实面目，国家和民族才能避免重蹈“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覆辙，这是我们一代人的责任。

2012年2月3日

## 【序跋】

## 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 ——《血的神话》序

丁 东

谭合成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于1997年。我和陈敏之先生应黄德志女士之邀，编辑了《顾准日记》一书，但出版受阻。当时担任《书屋》主编的周实，介绍我认识了运作过《中国左祸》一书的谭合成。谭合成拿到稿子，很快说通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并自己承担投资风险，迅速推出此书，知识界争相传阅，堪称一时盛举。

谭先生学工出身，却酷爱写作，他的报告文学在1980年代就名动三湘。当时，中共高层老人重掌国柄不久，在各级政权中剔除文革受益者的目的还未达到，余悸犹在，所以强调彻底否定文革。主流文学界看准了文革题材的轰动效应，所以也十分热心组织和投入这方面的创作。作为大型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谭先生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采访良机，以官方身份深入道县，全方位采访1967年发生的大规模杀人惨案。谭先生采访时，道县惨案善后工作尚未结束。这使他不但可以查阅全部原始档案，而且可以采访大量当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包括在押的行凶者。以后20多年间，他又几赴道县，补充调查，全方位、多层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本题为《血的神话》的大作，长达50万言，不但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有各方面数据的详实统计和分析，有对大量个案的生动描述，如实地记录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可以说，为这起不能掩盖也不应遗忘的暴行，建立了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道县事件发生于文革期间。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县全部10个区，37个公社，都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暴行，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占全县总人口1.17%。受道县影响，杀人风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区其余九县市，全地区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长久不散。

读完这部大著，掩卷长思。我不能不思考，这种暴行到底起因何在？

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文革前期担任 47 军军长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黎原将军，当时曾和华国锋等人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杀人风的蔓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但是，谭合成却告诉我们，1984 年，处理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就调查清楚：“被杀的 9,000 多人中，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也就是说，所谓敌情根本不存在。而杀人过程中也不是两派互相残杀，而是人武部支持的一派，屠杀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政治贱民。黎原写回忆录时早已不在湖南工作，凭借的还是 1967 年的印象。而谭合成的答案，则建立在反复调查和比较鉴别的基础之上。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野蛮征服曾经一再发生。杀戮男性，占有女性，是征服者的惯用方式。类似的血腥的屠杀，也曾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次上演。然而，1967 年的道县事件，虽然在行为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主导性的理念不是对异族的征服，而是在“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后，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演变为治国之道。他把人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剥夺资本家、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其肉体。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实践，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解和发挥。打土豪，分田地，伴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生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内容。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国共合作，一度改行减租减息的温和政策。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从解放区到全国，再度开展土改运动。其间打死、逼死的地主富农难以数计，仅 1947 年几个月内，在北方的几个解放区就死

了25万人。1950年代，胡志明在越南曾经试图和平土改，受到中共的批评。到了文革年代，暴力土改仍然是执政党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县杀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补课。当时的杀人风，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继续和重演。不同点仅仅在于决策者不是中共中央和高级干部，而是出自县、区、乡、村几级基层政权。掌握县级领导权的是人武部，实施者是人武部、“红联”和区、社、大队三级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当时介入杀人的国家干部有42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农村基层干部有2,767人，占全县基层干部的66.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参与或支持过杀人的地方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数年以后，又重新入党，官复原职，有的还得到提拔和重用。他们本来就是执政党的自己人。

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也非道县在文革中首创。毛泽东称赞“好得很”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就掌握过生杀大权。1947年，领导解放区土改的刘少奇曾经主张，组织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农会各派法官，土改期间每村都搞一个，给他们杀人权。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也曾经指示把死刑的批准权从省下放到专区。并提出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可超过千分之一点五。那场运动实际杀人为71.2万人，占当时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最高领导人预先确定杀人的百分比，已经埋下了大规模错杀无辜的隐患。当今世界，许多文明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其他文明国家执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国大陆近年将死刑的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说，这是靠近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步。谭著告诉我们：如果基层官员握有生杀大权，且无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后果是多么可怕！

道县惨案，放在人权意识有所觉醒的今天，可谓骇人听闻。但对于这种暴行的反思和检讨，在中国大陆仍然困难重重。历史的伤疤仍然被权力有意地粉饰。在全球范围内，希特勒等种族主义狂人的大屠杀受到了文明人类的一致谴责，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阶级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只在部分欧洲国家得到反思和清理。最近，对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的审判刚刚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杀害无辜的政治运动，上自建国初的土改、镇反，下至1977年对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等一批政治犯判处死刑，许多历史

上的暴行尚未得到清理。谭合成先生正是清理历史的先行者之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遮蔽国耻，四维不张。中国应当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承担起清理历史的使命。让中华民族的复兴，真正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石之上。

谭合成著《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 【序跋】

## 写在前头的话

## ——《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序

宋以敏

杨荣甲写了一部《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经历》，一年多前就曾拿给我看，最近要在香港出版发行。他提出要我给这本书写篇序，我又细读了一遍。虽然感到写序的能力不逮，难当重任，但每次阅读都会引起我的诸多感想，所以愿为本书写篇读后感，作为《写在前头的话》，向文革史研究界和广大读者推荐这部资料扎实、观点鲜明的著作。

杨荣甲是文革初期外交部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活跃了一年左右。后来他又成为部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以下简称“抓五一六”）的重要对象之一，受到残酷清查和严肃处理，直到文革后期才去掉一项莫须有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有这样颇带传奇色彩的十年文革经历，又通过文革后30多年的不断研究和反思，作者为错综复杂的外交部文革研究提供了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可贵史料。

我和作者文革中同在外交部，文革后又一度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一起工作，应当说是比较熟悉的老同事了。也许只是由于出身和处境不同，导致了一些不同的遭遇。他是根正苗红，成了外交部文革初期的弄潮儿。我却因父亲在台湾，丈夫何方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的主要成员，平时就有点自觉低人一等，运动一来更是向后靠，所以文革开始后，就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先是跟了部、司领导一阵；后来成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联络站”），并由周恩来总理指定它领导运动，就又跟了联络站八九个月。总的说来，在文革中，我既无条件表现积极，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包括在抓五一六时没有受到牵连。因此，我的感受不像作者那样深切。只不过作为外交部文革的一个近距离旁观者，多年来也是感慨系之，对外交部抓五一六的感触尤甚。

外交部文革经历了界限分明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革初期，历时半年左右。这是后来被称为原领导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期。主要内容是，部党委抛出三十多名“牛鬼蛇神”，交群众专政和揭发批判。这个阶段的一个重大

事件是，在部党委主持下，外交部全体人员参加，残酷批斗 1927 年入党的部党委委员、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这次批斗的粗暴程度，后来在全部范围内再也没有重现过。第二阶段是联络站控制运动的九个月。他们干了不少错事，最突出的也许应算揪斗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特别是在揪斗陈毅问题上和周恩来总理的纠缠顶撞。但它领导运动的时间短，到清理和处理干部时早已没它的份儿了。第三阶段是从 1967 年秋天到文革结束的七八年，由部党委和各级领导直接控制运动，主要内容就是抓五一六。既然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荒唐的闹剧，那么，每个阶段都做出一些荒唐事也就毫不足怪。不过在关系到对人的伤害上，各阶段则有不同的主要责任方。应由联络站负责的不到一年。应由部领导负责的超过九年，如果加上文革扫尾，甚至可延长到十三四年。从外交部人员受害的范围和程度来看，最严重的是抓五一六运动。运动的打击对象主要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即联络站的头头、骨干和积极分子，也包括被当权派视为异己的部分干部和群众，不管他们是不是造反派。

外交部的文革和其他国家机关的文革大同小异，并不是一个特例。同其他许多单位相比，在行为上，外交部文革还相对地文明些。文革时期在对外关系上执行了十多年的极左路线，导致了在国际上空前绝后的自我孤立，以至同一些原来友好的国家像印尼等竟然断了交。但这是文革本身决定的，并不是外交部内部运动造成的后果。外交部文革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只有抓五一六。这才是外交部在整个文革中的重头戏和头等大事。外交部抓五一六有毛泽东的直接关注和周恩来自始至终的具体掌控，大概是他们发动抓五一六运动的重点单位之一。这又使外交部成为全国抓五一六的先行者和样板单位。抓五一六是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历时七载的运动，无论在外交部还是在全国的文革史中，都不应该被减弱甚至抹掉。那样做，就是对抓五一六中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缺乏交代，会使他们，包括被迫害致死者，都只能冤沉海底。这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的读后感就想着重谈谈抓五一六这件事。

本书作者的经历，在抓五一六这个冤假错大案中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书中的叙述，也更加证明了人们原先对抓五一六运动的理解，即这是文革中自上而下镇压造反派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周恩来在毛泽东和林彪支持下，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一场运动，得到文革初期受造反派冲击的各级领导的坚决支持和贯彻执行，

性质是对造反派的打击报复。毛、林、周的重视抓五一六，从清查五一六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陈伟 1971 年 8 月 11 日在一次汇报会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说：“毛主席对清查‘五·一六’非常重视，从运动开始，到运动过程中，凡是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倾向的时候，毛主席都非常及时地做了明确的指示。”“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也非常重视。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就专门讲了一段。……以后，在深挖‘五·一六’的过程中，林副主席又做过好多指示。”“总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对深挖‘五·一六’都非常重视，特别是总理、康老、江青同志经常不断地对深挖‘五·一六’做出指示，经常讲这个问题。”<sup>1</sup>

抓五一六是使全国人民残酷受难的文革闹剧中更为荒唐的闹剧，是在文革中受害人最多（据说在抓五一六运动高潮中全国被抓的有上千万人）的大案。“混战”了七年后，才弄清楚和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一个全国范围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 1967 年春夏确曾出现过以“五一六兵团”命名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但它只存在几个月便被取缔。此后全国就连一个“五一六分子”也没有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就成了唐·吉诃德和风车的大战。由于领导上不愿认错，所以成千上万人员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一严重事件，实际上竟被浮皮潦草地一风吹掉，整个运动也得不到平反。

对于外交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全国掀起抓五一六运动的重点之一或“试验田”，书中提供了不少直接、间接的证明材料，下面可以简要地提一下。

先看毛泽东的关注。

据作者介绍，毛泽东对外交部文革初期的两派群众组织很早就作过具体的表态。1967 年 6 月和 7 月，毛泽东两次通过王海容，透露他对外交部无产阶级革命派（以下简称无革派）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成立宣言比较感兴趣，对他们上报有关王炳南、陈家康的材料也有兴趣，而对联络站上报有关陈、姬、乔的材料则没多大兴趣，说以后不要再送了。这说明，对外交部，毛泽东在 1967 年夏已站到“无革派”一边，不支持造反派了。毛对部党委成员还有过另一次表态。1967 年王力 8 月 7 日接见联络站核心组成员谈话后，联络站核心组向周恩来上报关于在外交部成立新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周上报了

<sup>1</sup>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 年（第三版）。

毛。毛说，外交部的造反派要三弱（指名单里有部党委委员中权力较小的罗贵波、徐以新、董越千），不要三强（指部党委委员中主要当权的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毛泽东 1967 年 8 月 26 日把王力上述谈话说成“大大大毒草”，接着很快就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正式公布了他对五一六的反革命定性。9 月下旬，王海容和外交部无革派的刘华秋去见毛泽东，汇报王力谈话后的外交部运动情况。毛给他们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用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们由此得知，王（力）、关（锋）、戚（本禹）大势已去。消息一传出，王、关、戚和联络站同时顷刻垮台。接着王、关、戚就被定为五一六的黑后台，联络站的头头和骨干被当作五一六的主要嫌疑犯开始被抓。此外，1968 年毛还在章含之的“谢富治支持‘六一六’（北京外国语学院公开反对周恩来的学生组织）”告状信上做批示，<sup>1</sup>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不易，要请总理出面解决。

事后看来，抓五一六既是毛泽东 1967 年夏决定抛弃并进而镇压造反派的重要措施，也是在文革过程中陆续清理领导层的一种手段。

毛泽东发动文革后，先是支持人们起来造反。过了一年，全国开始失控。为了稳定局势，他决定要转而依靠原有的领导体制和维护这一体制的无革派来推进文革。这一点在军队的表现，就是支持 5 月 13 日的三军联合演出和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处理。在政府系统，外交部联络站的倒台或可视为重要标志。军队一些机关院校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也都成为抓五一六初期的主要对象。一年以后被毛泽东接着抛弃的学生造反派，也落到相同的下场。各级领导自然由衷拥护毛泽东抛弃造反派的决定。而抓五一六，对稳定当时局势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对于 1967 年春夏一部分激进学生和工人造反派先后制造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等几件恶性涉外事件，毛泽东后来在对外谈话中也把罪责一概推给了外交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五一六。1970 年他接见来访外宾时就多次提出外交部有个五一六，还说 1967 年外交部有两个月失控、被夺了权、烧了英国代办处等。这些外宾有朝鲜的金日成、美国的斯诺、越南的黎笋和阮氏萍、斯里兰卡（那时还叫锡兰）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等。

对于抓五一六，毛泽东不手软。前面提到的陈伟在汇报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一次针对一些单位不认真抓五一六，毛主席指出：“有一些同志从极‘左’跑到

<sup>1</sup> 外国语学院教师、毛的英文教员

极右，它不清查‘五·一六’”；另一次是针对“极少数的单位对‘五·一六’出现一风吹这个倾向”，毛主席又指出，“对‘五·一六’的问题不能一风吹。”还有一件事，就是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后对外交部湖南干校领导刘华秋提出批评。1970年3月，作为中央抓五一六专案组的组长，陈伯达曾提出要注意抓五一六有个扩大化的问题。刘华秋也认为湖南干校抓五一六扩大化了，就向毛泽东反映。毛的批语是：刘华秋这个人忽左忽右，看来他不是跟我，是跟着陈伯达的。估计引起毛泽东不满的，大概主要就是因为对抓五一六的看法，刘华秋和才被他打倒的陈伯达搞到了一起。不久陈伯达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毛泽东批示“同意”的《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sup>1</sup>在“3，陈伯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一节中说：“他是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毛泽东对刘华秋的上述批示也显示，他无意在外交部抓五一六上松点绑。

事实证明，五一六已被用作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代号，因此可以随便给文革中遭整肃的任何高级干部戴上“五一六黑后台”的帽子。陈伯达等八人，先后在1967年秋、1968年春和1970年秋被戴上这顶帽子。最后是1971年9月13日出逃的林彪，他成了五一六的总后台。这个代号甚至还用到了文革前的刘少奇头上。周恩来1970年1月24日和康生、江青一起接见中央直属系统等几大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就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于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sup>2</sup>

这样一来，“五一六黑后台”也就成为各单位给要“打倒”的领导干部们戴上的通用帽子。在外交部就曾给刘晓和联络站建议结合进领导班子的罗（贵波）、徐（以新）、董（越千）戴上这个帽子。1972年秋，甚至一度还准备把这几名“黑后台”同早已被打倒的张闻天联系起来。

其次，看周恩来的直接指挥和具体督办。

周恩来本来就反对文革的造反。何况有些学生造反派还图谋造他的反，1967年春甚至拿出早已弄清楚的当年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做文章，而先前以五

<sup>1</sup> 1971年2月25日中发〔1971〕6号，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第三版）。

<sup>2</sup>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第三版）。

一六命名的学生组织正是公然反对他的。毛泽东抛弃造反派，给了他减轻困难、扭转乱局、整顿政府机关的大好机会。因此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很快就积极掀起抓五一六的运动，一直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

周恩来从外事部门开始，先是取消造反派对运动的领导权。他后来表示，他支持联络站到1967年8月31日为止。在两三个月里，他接连几次肯定，联络站和五一六有关系。1967年8月25日，他严厉警告联络站核心组，“‘五·一六’在外交部有根子，有人在外面打着‘联络站’的牌子干坏事，你们知道不知道？将来你们跳进黄河洗也洗不清，中央文革那里有材料。”10月18日他向外交部礼宾司参加接待毛里塔尼亚外宾的人员说：联络站同北外“六一六”关系密切，并且直接间接地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还讲，名字我现在不说，我有名单。10月18日韩念龙副部长在外交部全体人员大会上下达周总理指示，宣布联络站核心组有人同五一六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此语一出，外交部一个成员占全部人员绝大多数的造反派联络站当即垮台。

周恩来接着把五一六定性为矛头指向整个无产阶级无革派司令部的帮派。他在1967年10月26日接见外交部五个群众组织和外办代表及外交部、外办当权派时提出，“‘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江青、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形‘左’和右会走到一起去。”“‘五·一六’是个反对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五·一六’它的目的是要首先动摇、削弱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拿反对我做幌子……‘五·一六’挑拨中央文革与我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动摇军队的威信、影响军队的威信；搞掉无产阶级政权。”周恩来11月12日接见驻外使馆代表、12月1日接见外交部党委、大联筹和使领馆等代表时都谈到“五·一六”目的是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个乱七八糟。<sup>1</sup>

为了使联络站承认和五一六有关系，周恩来亲自对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做工作。1969年3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军代表和无革派负责人专门谈抓五一六问题，也安排王中琪、黄安国等前联络站核心组头头和主要成员参加接见。周一再点到黄、王两人，要他们老实交代五一六的组织问题。周恩来不但亲自规劝，还做出承诺，表示他们交代后还会继续得到使用。年青人听了总理的话，会是何

<sup>1</sup>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等感动和自疚，可以想见。他们都很快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周恩来还专门找林兆南（文革后出任驻美公使和驻叙利亚大使）这样的外交部老干部谈话，竭力规劝他坦白交代。作为归国华侨的林兆南，对总理的接谈深受感动，也就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但回来一想，又觉得这是欺骗组织、不说实话，实在不应该，因而提出翻案。时任常务副部长的姬鹏飞认为，总理亲自动员坦白的五一六高级干部不能在他手里跑掉，因而又找林兆南恳谈规劝。林在感动之余也再次承认是五一六。可回去一想，仍觉不妥，于是再次推翻。由于多次反复，遂在外交部抓五一六中有“七进七出”之说。

只不过要使五一六由本来并不存在，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也实非易事。所以在如何抓上就颇费周折。尽管专案组已经取得“突破”，使联络站的主要成员——新闻司的成绶三和黄安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洪嘉承认他们三人是五一六的组织部长和作战部长，发展了好多人，但始终拿不出个真凭实据。这时办公厅文印处有人被迫承认是五一六，还捏造经他的手印出了八百或一千份表格。于是就集中力量追查填没填过参加五一六的表格。可是攻了好几个月，运动还是处于顶牛和停滞状态，因为始终没有查出填过的表。

出现转机是1970年11月周恩来对外事系统有关负责人的四次讲话。他说填不填表不是主要的，重在看罪行，像姚登山这样的造反派头子参加五一六还要填什么表？他具体提出在外交部划定五一六的几项罪行。此后，只要同这项或那项罪行有牵连就是五一六了。这样一来，局面迅速打开，经过严重的逼供信，一大批人先后被迫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了。

抓五一六，光承认自己还不够，还得供出组织系统和介绍人等。于是乱咬乱供成风，以至一再发生抓五一六专案组的人员也有被咬上的。新闻司一个年青同事在湖南干校参加专案工作，因感到自己已被怀疑而精神失常。甚至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也被咬上，为此被调回北京交代问题。最后，连当权的姬鹏飞和乔冠华都被咬上了。只是咬他们的这个人反而最后被正式戴上了五一六分子帽子。

随着抓五一六运动的迅速升级，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等不少单位，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员被打成五一六，但周恩来仍不承认在外交部抓五一六有扩大化。他在前述要以罪行定五一六的谈话中，针对陈伯达提出扩大化的意见说，扩大化主要是讲学部和文艺部门。他的意思是外交部并不在内。而此前外交部已有多人向他反

映过扩大化的问题。有联络站的，也有无革派群众组织的。前者如朱根华和黄祖轅。黄曾为此给周恩来写过七封信。后者如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张燕龄。外交部军代表李耀文也感到有问题。但是李因此在外交部处境困难，随后被派往非洲当驻坦桑尼亚大使。这也可说明周恩来对他是有看法的。

周恩来也是1972年给外交部20人正式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的定案者。马继森在所著《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中说，这在全国只此一家。<sup>1</sup> 对于在大范围和长时间被讹传当了“四天外交部长”的姚登山，不仅成为外交部头号戴帽五一六分子，还被糊里糊涂地关进秦城监狱。只是外交部始终落实不了他的五一六罪行，他的党籍也从未被取消过，文革后从监狱放出，仍是党员。

杨荣甲还在书中以浓墨重彩介绍了十分典型的朱根华事例。朱根华参加过联络站，但一直是联络站里的温和派，和后来给外交部五一六定下的任何罪行都没有干系，一直被大家称为“老保”。1980年平反时，外交部专案组也说他和另外19名戴帽子五一六分子不同，是冤枉的。但他却硬是被当作五一六抓起来，而且在湖南干校抓五一六宽严大会上被当作“拒不承认、从严处理”的典型，当场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朱根华说，他的问题是周恩来亲自定案、毛泽东画圈同意的。

经过抓莫须有的五一六的运动，最后在外交部三千干部中抓出了1700名左右五一六分子。他们受到正式戴帽、各种不同处分或留下写上犯有错误的结论等处理。文革后，这些虽然都只能一风吹了，外交部也再不提当年抓五一六这件事了，但大多数被抓者的命运仍然终身都受到影响。他们一直被划入“文革中站错队”的另册，成批地被调出外交部。对于调不出去、不得不自己消化的人员，安排也自然会受到歧视。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生前已经弄清，全国并不存在一个五一六组织。但作为抓五一六的总司令，他始终没有表过态，更不用说认错了。原因大概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表过态。周恩来以勤于自我批评著称，其实那都是在毛泽东表过态的问题上这样做给毛看的。

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外交部也一直遮掩当权派在抓五一六问题上所犯的过错。1978年5月，我被最后安排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并且当了综合

<sup>1</sup> 见《外交部文革纪实》第239页。



组的党支部书记，因此参与了一点综合组的落实政策工作。在外交部复查组提出文革总结报告稿征求各单位意见时，正因有感于外交部只算文革一个短时期的账，我正式提出意见：报告一开头就应该说明，“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了错误的或过分的批判和处理。”这个意见未被采纳。外交部的主流说法一直是，外交部文革中的一切错事坏事全都是造反派干的，而造反派专指联络站。再往上，就算成是林彪、“四人帮”的账了。

外交部主流派避而不谈抓五一六运动，不仅是为毛泽东、周恩来开脱，也是在为自己掩盖。这大概是外交部抓五一六的冤假错大案得不到正视的主要原因。

对于抓五一六冤案本身及其严重影响，高层领导是了解的。邓小平早就谈过抓五一六带来的后果。1975年5月29日，他从铁路交通的混乱讲到徐州的例子，说：“清查‘五一六’徐州搞了六千多人，这是个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如果按五口之家来算，再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波及的面就有好几万人。必须使他们很快把包袱放下来。”<sup>1</sup>这是高层领导第一次谈到抓五一六的负面影响和要求尽快纠正，当时曾受到外交部五一六们的极大注意。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胡耀邦有关五一六问题的讲话和做法。已查到他在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对五一六问题的三次讲话，说明他不仅重视，而且要求实事求是地处理。

一次是，他把乱抓五一六提到事关干部、党员的良心和党性的高度。1977年6月18日，他在出席中央党校整风会议时插话说：“搞‘五·一六’，急如星火，上面某某人有指示。指示可给大家看看嘛。因为上面某某人有指示，我就可以违背良心，违背党心。这还能当共产党员啊？某某人有指示，我可以调查。调查没有，去汇报。还要搞，我再调查。如果这个中央首长催，我就担保，没有。这就是党性。你搞了一大片，多少人家还不会忘。你说，没有办法，上面催我的。自己要承担起来，触灵魂，自己错在哪里，群众的气就消了。”<sup>2</sup>

那时胡耀邦正以极大的政治魄力平反冤假错案，包括五一六冤案。他知道在五一六问题上拨乱反正的阻力很大。文革结束后，外交部就因在拨乱反正中表现

<sup>1</sup>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页。

<sup>2</sup> 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3页。

落后受到过胡耀邦的干预。1977 或 1978 年，国家广播事业管理局的一位负责干部和外交部专案组负责人一起在中组部开会汇报情况，他听到，外交部专案组长谈到对外交部已摘帽五一六分子的处理问题时仍然坚持文革中对他们“罪行”的种种原有说法。胡耀邦后来有针对性地表示，不能全由原来搞专案的人员来做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抓五一六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也要处理几个。之后，外交部确有个别这样的干部受到了处理，但应负主要责任的并未受到查问。

胡耀邦另一次是谈到五一六冤案和其他冤案一样，都要查。1978 年 2 月，他在出席疑难案例座谈会上谈到“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等波及全国的大冤案时说，“还有成千累万的‘五·一六’分子。什么‘五·一六’？不就是那三个阿拉伯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sup>1</sup> 第三次在 1978 年 3 月 22 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国家机关十四个单位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时，又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把别人瞎整成五一六和被整者所犯的具体错误。<sup>2</sup>

最后，在这里还愿意提请读者注意杨荣甲这本书的附录，就是他 1980 年年底所写《我国外交方针有没有另外的选择？》这篇文章。这个问题不是本书的主题，却让人联想到我国内政外交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这样一个大题目、大文章。观察文革、观察有关国际形势分析和内外政策建议的各种主张和议论，从这个角度出发，会让人获得更清晰的认识并引发更深入的思考。也希望杨荣甲能把这篇大文章接着做下去。

2011 年 7 月 2 日

杨荣甲著《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 年 7 月出版。

<sup>1</sup> 同上，第 142-143 页。

<sup>2</sup> 同上，第 151 页。

## 【读书】

## 读胡发云小说《隐匿者》

## 童话

本文是我读胡发云的文革题材小说《隐匿者》的印象和感想。

《隐匿者》的故事梗概如下：名校文博中学举行90周年校庆动静甚大，汇集了众多头面人物和名声显赫的校友，声势远播四方。副市长吉为民是该校的校友，并在校庆筹备会中任职。校庆热期间，他在报上偶读一篇题为“隐匿者”的文章，受到了雷击般的震动。文章作者索咪咪是文博中学校长——文革受难者索一夫之女，她叙述了1966年8月父亲的死。索一夫校长是在遭到三名红卫兵学生的审讯和殴打后困惑、愤慨、绝望，用钢笔戳喉自杀的。索咪咪写道：“伤害过甚至残害过别人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成为了一批藏得无影无踪的隐匿者”，“以至我在和别人交往时，常常会毫无缘由地想到，他会不会就是打我父亲的那个人呢？他会不会是一个曾经伤害过别人，但却装得若无其事的隐匿者呢？”

吉为民的记忆复苏，清晰地回忆起正是自己和另外两名同学审讯和殴打了校长。吉为民希望在今天对校长之死承担个人责任，他不顾各路劝阻找到索咪咪，在她面前说了实话。但这清洗良心的举动承担的后果是，他原来看好的仕途断送，生活陷入阴暗的中伤之中。

《隐匿者》涉及文革历史，也触及当前现实。作者围绕隐匿者吉为民能不能、该不该走到阳光下现身，围绕隐匿者现身的意义和代价，在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建构了丰满的情节和尖锐的冲突，令人掩卷沉思。历次政治运动造就了无数的隐匿者，也形成了隐匿者生存的人际环境和秩序。因此，那些举足轻重的隐匿者要站出来，哪怕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不具有挑战制度的性质，只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个人担当，也已经不是简单的事情了。不允许检视历史的规则以及“不堪回首”的暗示，正使国民处在以淡化思考为妙，以物质利益为上，以做隐匿者为妥的污浊生活中，有道德追求并希望与恶决裂的人鹤立鸡群，因打破隐匿者的秩序而倍受伤害。但是，人毕竟是人，还是有人懂得，结束隐匿站到阳光下，对于自己是重要的。

读这部小说，我有读奥威尔的那种折服感。1948年，没有在极权社会生活过的英国作家奥威尔写了《1984》，那部反乌托邦小说所预言的后来在极权国家里都真切地发生了。写于1999年5月的《隐匿者》，也写到了与2007年9月北京一座名校90周年校庆的现实若合符节的程度。作者胡发云能像奥威尔那样，出色地预见带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社会生活，这是我的强烈印象。

写文革的作品如果不触及文革是由血统论出发的血腥迫害开始，就必然走样。而《隐匿者》中的文革场景恰恰准确还原了“血统”贯串的祸乱，因而势大力沉。每个人物出场都交代“出身”。如，吉为民是革干子弟，但他父亲“与本地诸侯无牵无挂，是一只偶尔飞来的孤雁”。与吉为民一同审讯殴打校长的红卫兵何延辉，父亲的“军阶在红五类中排第三”，红卫兵张小娜之父是“地方干部”，她“弄了身军装穿”。“那天下午，班上所有的红五类都到一个同学家抄家去了，一部分出身职员、小商、城市贫民的‘红外围’也跟着去了——他们没有资格抄家，但是可以在外面喊口号，看守那些被抄的财物和罪证。”在审讯殴打索一夫校长的阴暗小场景中，能看出外界的血腥和混乱以及父亲政治地位的动摇，造成了吉为民对沦为革命的边缘人的惶惑和焦虑，他那样文质彬彬的好学生，在复杂的心情下瞬间出拳打了校长；而校长遭到光天化日之下的迫害，也正因为他被“血统”划为敌人和贱民。按照血统划分出被迫害的群体的历史后来讳莫如深，所以多年后吉为民身为副市长，何延辉身为驻外使节，张小娜身为大公司董事长时，只能隐匿在靠遮蔽历史生存的势力之中。

审视污浊的现实，作者的视角却很善良。看文博中学90周年校庆，对它历史的赞叹、对它人才辈出的赞叹、对它欢腾温暖的场面的描述，对它众多校友的泪眼和真情的描述，都是真实的。鲜花笑语掩不住名利场的恶臭，要靠读者自己分辨。老市长慈祥、善意、风趣、机敏，对青年干部倍加爱护，竭力指导，也都真实动人，毫不埋藏揭露位高权重政客的笔锋，只把价值的评判完全留给了读者。

写得最生动传神的是阻止吉为民承认自己是施暴者的种种似是而非的“道理”。这里列举老市长语录一、二：

我们中国人是讲现世的。没有彼岸，也不讲来世。康生怎么样？谢富治怎么

样？现在都是一堆臭狗屎。可是他们当初死的时候，不是享尽了盖世风光？

我们要是在每件事上，都像圣徒一样跟自己的失误和罪过过不去，那么，我们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就剩不了几个人了，也就没有今天的稳定也没有了今天的进步……

再列举张小娜语录一、二：

索一夫的女儿，她想干嘛？

去她的吧。她爹不是自杀的吗？现如今是怎么啦？三十多年的老账也翻出来，要反攻倒算哪？

我爹后来比索一夫惨的多，要不是意志坚强，不知要自杀多少回了！

不把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写成江湖恩怨的关系，体现了《隐匿者》立意的高明。作者对吉为民的人品做了满含褒义的评价，他作恶后的遗忘现象并不受怀疑或谴责，因为按心理学原理，那也有可能。受害者家属索咪咪追寻隐匿者的意图也避免了追凶的简单化，作者让索咪咪说出：“让我难受的是，这么一个大好人，死在一个同样也很好的少年手中，死在一群很天真很热情的孩子手中，真是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情了。”这就把锋芒指向了某种使人丧失人性的教义，悲愤地诘问：谁把生活糟蹋成这样？怎么能结束这样的生活？作者深究罪恶时并不去占据审判者的制高点，他敬畏真理，并具有了解人的局限性的自觉。

《隐匿者》的结局是主人公吉为民的仕途断送了。知耻者、忏悔者、诚实人失败了。作者要告诉读者什么？我大胆地认为，他不是告诉读者善的幻灭。

犹太神学家撒姆尔·S·科亨说，“在混乱无序的背后存在着某种使之有序的力量、原则或实体，有一种智慧和一种目的在规划和引导事物朝其注定的目的前进。……在人的一生中，若能敬畏这种建立秩序的倾向即正义和爱，并与之结成同盟，就是人的至善和最大智慧。”<sup>1</sup> “善行、恶行的真实报偿就是其行为本身。

<sup>1</sup> 《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1 页 54。

善行导致更善，恶行跟随恶行。”<sup>1</sup> 吉为民少年时期有恶行，他曾经遗忘自己的恶行。当受难者之女索咪咪的追问触动他的时候，他恢复了记忆，思考的结果是希望不失去诚实的品德，要说出真相，真诚认罪，安慰索咪咪，在自己的女儿面前获得好父亲的资格，所以他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结束了做隐匿者的生活。这样做，他是与恶决裂了。仕途断送，似乎善的举动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可是其实他得到了。他已经选择了善，不再是迫害校长的那个他了，也不再是做副市长时期的那个他了，他有了人性，思维和行为合乎了人道，这就是他得到的报偿。有理由相信，未来他会更加正直，这样的报偿难道还不使人欣喜吗？相反，张小娜何延辉们，他们青年时期有恶行，靠“血统”和特权，私设公堂，审讯校长，出手打人，致人死命。后来他们却名利双收，腰缠万贯，如今还是高官厚禄，锦衣玉食。看上去，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恶行本身就是他们的报偿。往未来看去，时间不多了，他们有人性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只能不断地罗织谎言，隐瞒真相，攻击证人，切磋阴谋，他们只会一个恶行接着一个，走完短暂的人生。这样的报偿难道还不够吗？

《隐匿者》唤起在更高层面上要去面对的问题。我相信读这部小说人们会对这种呼唤有感应。当然仍会戳不到某种人的痛感，那些灵魂岂是一部中篇小说就能挽救？

在结束我这篇读后感时，还想提一提《隐匿者》中所说的“香港中文大学资料中心”。历史留痕，在那个地方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作为小说，资料之全之说可能有虚拟的成分。作者可能是想强调，“不要试图隐瞒证据，因为证据最终会被暴露”（罗素语）。每个人做的总会有痕迹留在世界的一个地方，抢在资料公布之前做诚实的叙述，回归到阳光之中是多么重要。

2012-2-14

---

<sup>1</sup> 《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页104。

## 【读书】

## 天地有正气：读《血的神话》有感

夏瑜

少小只为颠簸苦，老来无事再读书。

最近我有幸读到一本名曰《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的书<sup>1</sup>，感到非常震撼，道县大屠杀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四十年来，我们被瞒得好苦，欺得好苦啊！

道县文革大屠杀我很早就听说过但不知细节，即使在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权者和当事人都仍然讳莫如深。我们听说过纳粹屠杀犹太人，听说过红色高棉暴行、前南的种族灭绝、苏联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但对于就发生在我们湖南并时隔不久远的道县大屠杀却知之甚少。甚至那些从门缝里得到的一点可怜的信息都混杂着一些别有用心心的误导。读了《血的神话》才了解事件的整个过程和一个个血淋淋的故事。作者对被害者遗属、幸存者、杀人者、组织者、见证人等各方面进行了详实的调查采访，那些字字血声声泪的口述史，令人信服、无可辩驳地还原了历史真相。

生命无贵贱，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在和平时期，一个不足40万人口的县有组织地屠杀无辜平民4500多，<sup>2</sup>占总人口的1.17%，相当于每85人中杀1人，并波及到周边十个邻县，杀人总数达到9000余人，如果不是及时制止，有可能酿成地区、全省甚至全国性的大惨案。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从这个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暴行，联系到此前40年的农民运动、<sup>3</sup>此前20年的土改镇反，<sup>4</sup>从“一切权利归农会”到“一切权利归贫协”、“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评价的“好得很”的“革命的暴烈行动”，展示了从暴力夺取政权到暴力维持专制的历史脉络。为此我重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农民斗争“土豪劣绅”的主要方式就是：“吃大户、杀猪出谷分浮财、戴高帽子游街、驱逐、杀头”。毛说：“好得

<sup>1</sup> 香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作者谭合成。

<sup>2</sup> 主要是“政治贱民”即地富及其子女。

<sup>3</sup> 1927年

<sup>4</sup> 1950年—1951年

很”！“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毛以诗人的情怀和诗化的语言把这一血淋淋的现象描述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种暴烈行动一直延续到土改到文革。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当地基层干部把对地富及其子女的屠杀称作“第二次土改”。《血的神话》中记录的“枪杀、下窖、扔天坑、砍头、活埋、活刷、烟熏、坐土飞机、石灰烧死、剖孕妇、沉河”种种杀人方式，以及分抢财产、杀人夺妻、屠杀老幼妇孺、强奸轮奸种种暴行，包括文革中全国流行道县也不能免俗的挂牌子、戴黑袖章、喷气式、打砸抢、抄家、文攻武卫、继续革命……这些“新生事物”，叫法西斯、日本鬼子都要自叹不如。

“暴政加暴徒”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暴力革命理论煽动和控制民众的思想，利用暴徒和痞子恶棍，成就了一代暴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选”第一卷的开篇之作，是早期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农民造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氏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不彻底否定和批判，就不可能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周期律的的怪圈，不可能走上一条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法治的社会发展之路。斯大林死后仅仅三年，就受到了彻底揭露和批判，而毛死了快四十年，却仍然“为尊者讳”，被顶礼膜拜、奉若神明，有智者亦不敢与之切割。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不敢面对历史，如何面向未来？

道县文革大屠杀从发生至今始终笼罩着一个精心编织和小心维护几十年的说词，即大屠杀的起因是文革中两派的武斗以及所谓地富与子女组织“黑杀团”搞阶级报复，引起贫下中农大规模屠杀地富及其子女。我的手头正好有一本《黎原回忆录》<sup>1</sup>，黎军长当时是湖南“支左”部队47军的最高首长，曾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道县文革大屠杀就发生在他主政湖南期间。他在回忆录第九章中关于“道县问题的妥善处理”一段是这样说的：“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

<sup>1</sup> 200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但是，《血的神话》中却明确记录了：处理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的调查表明：“被杀的9000多人中，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这两点在2011年第11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原永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处理道县杀人遗留问题小组组长谢承年《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一文中也得到证实。

我不知道黎原军长的说法有何证据，也不知道他的部下是如何向坐镇省会长沙的他汇报情况的，但以他的身份和当时所处的地位应当不会言之无据。其中有什么隐情和深心的考虑，须请黎原军长说个明白。据我省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中国当代史中，湖南省可以进入史册的只有一个人和一件事，人就是毛泽东，事就是道县文革大屠杀。”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身居要位的知情者，可以三缄其口，但说出的话就要对历史负责，不能只作结论不讲证据。

目前，我所看到的是，谭合成先生在他的《血的神话》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道县文革大屠杀既不是某造反派组织抢夺县武装部的武器引起的，也不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引起的，<sup>1</sup>也没有农民群众自发起来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情况发生，至于地主家庭成员起而报复之说更是连影子都找不到。道县文革大屠杀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策划和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屠杀无辜平民的血腥事件。杀人者在面对处遗工作组成员追问杀人动机时，理直气壮地回答：“上面要我杀谁我就杀谁。现在，上面要我杀你，我也会杀。”“我杀人没有私心杂念，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煽动、策划、组织、实施杀人的责任人基本上没有受到追究，少数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杀人事件主谋受到了象征性的处理，判刑最长的13年。而这位对569条人命负有主要责任的干部只坐了两年多牢就出了狱，重新入党，官复原职，提拔重用，最后在县级领导的高位上光荣退休。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何种玄机？

我在阅读《血的神话》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在记录有关杀人事件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上都表现得胸有成竹、实话直说，但是在“第八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中记述进驻道县制止杀人的47军6950部队突然在1968年7月某日悄

---

<sup>1</sup> 这两件事在全国的每一个县都发生过。

悄连夜撤走，甚至跟他们一手筹建的革委会的其他成员连声招呼都没打，所有档案文件全部遗弃，就撤走了，致使道县文化大革命再次“翻烧饼”，大反复。作者对部队突然撤走的原因语焉不详，用了春秋之笔。其中原因究竟何在，是真相不能披露，还是有其难言之隐？我们希望作者能说个明白。也寄望于黎军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回忆。

全世界的主流政治理念早已进入了实话直说的阶段，普世价值简单而又和谐，得到了全人类的普遍认同。而在中国，当政者还抱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死不放手，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者手上握着的还是只有暴力和欺骗两件镇山之宝，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问题，而是他们如影随形的宿命。从目前的现状看来，暴力这一手好像还管用，但欺骗这一手已经越来越不灵了。俗话说，把戏不可久玩。一位魔术大师谈魔术表演时说：“门子没醒，<sup>1</sup>观众把你当神看；门子一旦漏了馅，观众就会把你当小丑看。”

披露历史真相不是目的，我们应该从中总结什么教训，如何避免类似事件重演？如何批判和清除遗传至今的暴力基因，改造我们国民性中的卑劣成分？敢于负责任的政府和政党应该如何担当历史责任？《血的神话》的作者对此有深刻的思考，这也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肩负的历史道义。

中国人历来喜欢把改变权力腐败现状的希望寄托于革命，把追求公平正义的希望寄托于革命，把改变个人命运的希望寄托于革命，这是中华民族一个顽固的文化情结。其实只要对高度极权的大一统威权政治的迷信不破除，只要民主宪政的意识不确立，只要普世价值的核心理念没有全面到位，意味着社会大变革、大进步的历史进程就不可能发生，一切所谓顺天应人的革命无不会堕落为诈仁假义的改朝换代和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周期律中。《血的神话》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群被戴上“四类分子”符号的人的被革命史，而在我们的前面，将还有一些什么人，被戴上什么符号，被进行革命，真的不得而知。人们哪，你们要警惕！

我是一口气读完《血的神话》的，以我这个年纪能够一口气读完这本一寸余厚的书，真的很不容易。非常佩服作者深入细致的调查作风、组织和运用纷繁复杂材料的能力、富于特色的景物描写、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短诗、平静客观叙述中包含着对人类共同苦难的悲悯，尤其是洞察历史、烛照人性的深沉思考。我读

---

<sup>1</sup> 门子：变魔术的专门术语，“机关”的意思。

过《墓碑》、《血酬定律》、《夹边沟记事》、《庐山会议实录》，《血的神话》完全可以与之比肩，从可读性而言可能还要略胜一筹。总之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佳著，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献给祖国的忠诚谱、正气歌。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我们这一代人面对后人的叩问不至于汗颜失语。

杨继绳先生在《血的神话》序中说：“这本唤醒人们记忆的书，可以作为试金石。它在中国的命运将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的状态？”目前坊间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改革的名义分脏，以和谐的名义封口。”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刻画出了一部分钻进共产党内谋求私利的人物的嘴脸。我希望《血的神话》能够尽快在大陆出版，让更多的读者早日读到它。

因为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

## 【读书】

## 竹幕后的血腥

庄生蝶

2010年底，我在一位朋友处得知，香港一家出版社出了一部揭露道县文革大屠杀真相的书《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50余万字，内容非常翔实，非常震撼云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为这一事件的铁盖子终于被揭开而欣慰；此外也有些许失落和遗憾，对于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自己曾关注多年，并数次赴道县秘密采访，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而这些努力可能因为《血》的出版而付诸东流；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记录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全貌，我自己亲身采访过，深切地感到此水深不可测。

今年4月，《血》的作者谭合成找到我，请我以大屠杀事件知情人和草根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对《血》“提出宝贵意见”。谭说他不希望《血》成为记录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孤本，希望更多的知情者、亲历者和理论工作者勇敢地站出来，写回忆录，写研究文章，进行反思，并引发全民族的反思，以推动社会进步。

通读全书后，我的第一判断是：这是一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虽然涉及面不如《古》广，但挖掘之深，剖析之细却更胜一筹，因而更有可读性，更具震撼力。我的一位朋友在阅读《血》时，血压高至200多，心跳加速到每分120多次，数次不能卒读。我本人应当说对这场大屠杀的血腥恐怖了然于心，也依然感到读来有如重锤捶胸。道县文革大屠杀比之苏联斯大林（我们的先生）的大清洗和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我们的学生）的金边大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作者并没有将他的笔触局限于对血淋淋事件的展现上，而是如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一般灵巧地对这一大屠杀事件做出了层次分明的解剖，让其中各层次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我不得不惊异于谭合成掌握材料之全面，对整个事件把握之准确，来龙去脉梳理之清晰。在他的笔下，人物、地点、时间，大的事件、小的细节，在交错着的蒙太奇效果中，重点突出，脉络分明，发人深省，促人深思。读完《血》，我心中原来的那些失落和遗憾在不知不觉地向远方退去，由谭合成来写作《血》，揭露道县大屠杀真相，只能解释为是上天刻意的安排。我们知道

中国的所有历史，素来有官史和野史之分，官史由于统治者的需要（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本能地作了歪曲和篡改，特别是近百年来来的中国历史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做了歪曲和篡改，而野史则由于信息来源的局限，难免掺杂许多猜测、臆想和演绎的成份，谭合成写的这部《血》，既不是官史也不是野史，而是一部信史。由于人生的际遇，谭合成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官方资料，又有机会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因而同时具备了官方记录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上天把这样的双重身份赋予一个有勇气和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有深意的。

由于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典型性和深刻性，关注它、记录它、研究它的人不在少数，早在四十年前事件发生之初，我就有了写它的冲动。那是1967年的8、9、10月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我参加了一个以下放知青为主体的造反组织，其总部就设在众神狂欢的中心——湖南省委招待所，在那里我第一时间接触到道县革联、教联的上访人员，从而了解到这场疯狂大屠杀的基本梗概，当时的说法是杀人3万，血流成河，大量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暴行，闻所未闻。之后，1978年、1990年我两次赴道县，后来又促成我的四弟在2000年赴道县进行了48天采访。那次采访因道县当地的几位朋友的鼎力相助，接触到许多大屠杀的亲历者、遗属以及逃亡者，例如周群、张引道、杨旺盛、王田芝、蒋正豪等，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史材料并拍摄了部分杀人现场的照片。但其后，在一次神秘事件中，四弟差点丢了性命，以致引起精神方面严重的后遗症，至今不愿再提及道县话题。现在材料和照片都保存在我这里，在《血》中，这些口述实录的史料都得到了——印证。谭合成希望我尽快将这些史料整理成文，公诸于世。我亦有此心，这也是我的责任，为国家民族计，为子孙后代计，每一个亲历和了解这场大屠杀的人都无权保持沉默。

作为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探索者，我对《血》的价值判断是：它完整地保存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反人类罪事件的全部真相，其揭示的特殊性是暴君的暴虐在以暴民暴虐的形式演绎，被运动的群众在官员的操纵指挥下，上演了一场异常暴烈的“群众运动”。其实，文化大革命之中和之前的所谓“群众专政”和“群众运动”，在本质上都是这样的，“群众运动”、“群众专政”与“运动群众”、“专政群众”实质上就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面。作者实录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

场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大屠杀，同时也可以算是道县的文化大革命史，更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高浓度的缩影。“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大军营、大农场、大集中营的过程，而维持这个大军营、大农场、大集中营秩序的是（也只能是）暴力、欺骗和洗脑。从这个意义上讲，《血》是一座认识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富矿，其中可供探讨的课题非常之多，有民族劣根性的，有土地革命性质的，有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有中国知识份子基因缺陷的，有党文化的，有毛时代政治体制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每一个阅读者，都会如入宝山，不会空手而归。

本人研究方向重点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故尔想在这方面谈谈自己的感受。窃以为，《血》是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最黑暗”时期的话语环境。谭的写作非常严谨，真实性为其唯一的考量，《血》的“几点说明”中表明：“我的这篇历史纪实是在大量这样‘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乃至每说过的一句话、每唱过的一首歌都来源于真实的记载，既无臆造人物，更无虚构事件，亦无杜撰姓名……”谭合成告诉我，正是由于这些原则，他忍痛舍弃了大量只有孤证或者当事人坚决不承认的史实，但因此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血》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原始性。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读来如进入了时空隧道，恍然有隔世之感，仿佛在过去与当下的二种语境中遨游。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则可以通过对《血》的阅读体验一番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环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那个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大量的革命词藻、口号、思维、逻辑，不论今天看来多么荒谬可笑，而在当时却是神圣而不容置疑的，是绝对正确的。那种煽动阶级仇恨、制造政治歧视、宣示革命暴力，鼓励迫害虐杀的环境氛围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喘不过气来；那种以简单的生活模式对全体人民进行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欺骗之中，无论你是革命对象的政治贱民，还是革命动力的政治愚民，统统一样。我的老父亲在回忆那个时代时，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是：“活下来真不容易！”

这句话也是《血》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句话，地主子弟朱贤厚这样哀叹过，被丢下天坑七天七夜而侥幸存活的周群这样哀叹过，告状油子李念德与右派分子徐老师劫后余生，第一次再遇时，感叹的就是“想不到都还活着。”这是那个时

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生存环境的总结性概括。现在那种语言环境已离我们远去，后代人对之已不甚了了，但产生这种语境的根源从来没有被我们的社会真正反思过，而是以一种国家主义话语全面娱乐化的方式被伪装起来。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机遇下，它会以何种形式而再度借尸还魂！这也算是我的盛世危言吧。

但我至今仍确实实地感到一股暴戾之气依然笼罩着中华大地。这股暴戾之气的根深植于我们文化传统之中，它不是谁的专利，但在1966年8月18日的天安门城楼上被发挥到了极致，此后北京红卫兵“红八月”暴行（在校园、街道打死1772名无辜人民）很快便蔓延到京郊的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8月31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口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sup>1</sup>1967年夏秋之交又在湖南道县地区凝聚……由此，我们不难判断道县文革大屠杀一以贯之的根源和脉络。

《血》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发人深省的追问，作者将书名订为《血的神话》亦是有深意的。噩梦纷纭的中国历史，观念误区太多，理论淤泥太深。传统中国社会，面对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思想语言壁垒。这是比制度壁垒更其顽固的壁垒系统。它既是各类极权政治人物刻意培养的，更是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利拜物教文化的土壤之中。<sup>2</sup>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极权人物，无不是利用这个壁垒，维持着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各种花样翻新的极权制度。他们歪曲篡改隐瞒历史事实，编造神话故事，与众多被偷换概念的词语一道，编制出了一批模棱两可非驴非马的文化符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误导人们的思维与精神。这个话语体系中存有大量含混、泛化、模糊的名词，有害于我们民族建立起一个明确而清晰的价值体系。厘清这一类词语的欺骗性，戳穿那些神话故事的虚伪，是中华民族真正伟大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记录“血的神话”，我们反思“血的神话”，为的是以后有人还想制造“血的神话”时不可能再那么轻而易举。

<sup>1</sup> 《那个年代中的我们》398-399页，远方出版社

<sup>2</sup> 权力拜物教文化是我对自秦以来中国两千余年文化传统的基本判断与概括。可参见拙著《中国人的文化陷阱——论权力拜物教社会的历史文化基础》

在此，我想顺便谈一谈《血》的文学价值和语言特色。凡历史实录一般以史料的丰富和翔实而见长，在文学角度难免流于干涩枯燥，而《血》则不然，它在保持史料丰富翔实的基础上，文字洗炼大气，具有张力，颇似太史公之风。特别是熟悉道县方言的读者，不难看到，作者的文字充满道县方言特色，如果用道县官话朗诵《血的神话》，你会深深感到一种苍凉和辛酸的韵味。本人数次赴道县采访，对此感受犹深。对于《血》，我的基本判断是，它很难为当政者所见容，但无论当政者的态度如何，它都是一部史学价值很高、文学性很强、生命力很旺盛的传世之作。

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见证”，见证的主要内容就是揭露极权暴政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对于这一主题，中国人有必要好好补课。因为中国至今没有一个清晰明朗的历史天空，尤其是近、现代史更是云遮雾罩，历史上的暴君没有一个被真正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厚黑教主李宗吾说：“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可以说直刺中国历史记录的实质。当下，一场口述史的创作潮流已在中华大陆悄然发生，这一自发产生的潮流与历史现状密切相关。但是在真实的记录历史被视为“反动”的中国，以董狐之笔还历史真相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血》做了一次真实见证历史的艰难尝试，也给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标高。对人性的审视，对人性深层面的探讨，尤其是对中国人观念根源和文化人格、文化心理深层次的审视和探讨，《血》都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剖标本。探索好了，将有助于中国人在精神上得到救赎。

梁启超曾于百年前说过：“日本人尝言曰：‘支那一部历史，实浓血充塞之历史也。’吾耻其言，虽然，吾不得不忍其言。”在文化血脉中，中国人的社会始终有一条一切规则由之发源的浓血规则，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世界上其它民族也有过历史上长期盛行暴力的时期，但是始终维护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掌握最强暴力者受不到任何力量制衡的则要首推中国。这条元规则，说穿了是利用暴力劫持社会的盗匪规则，所以中国历史始终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表述。正是这条元规则的存在，致使中国人的“权本位伦理秩序”中暴力成了最核心的权力，只要“权本位伦理”不转变为“人本位伦理”，所有的伦理都是经不起追问的伦理。法家创立的政治哲学法统和儒教（注意不是儒家）所创立的政治伦理学道统，无不是为暴力最强者服务的，所以牢牢抓住“枪杆子，



笔杆子”实际上是坚持暴力与谎言的支撑不动摇！

暴力劫持的最大特点是劫持者与被劫持者同时处于被劫持的状态中，绿林好汉要求新入伙者杀人越货作投名状，就是出于将新入伙者裹胁其中没有退路的考虑。中国历代统治者喜欢宣示暴力，耀武扬威，鼓吹“文治武功”往往把“武功”摆在更重要的地位，就是不断向臣民暗示自己暴力最强。

把嗜杀滥杀所制造的恐怖氛围作为最重要的统治资源，作为自己集团最重要的心理凝聚力是一种深心的考虑，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化中，对暴力的迷信与崇拜屈从是深入到骨子里的。

正因为有这种浓厚的暴力文化传统，所以一种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意识形态进入中国社会后会很快壮大形成高潮。这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实质。这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为”，收获的几乎必然是极权专制。大救星实际上离大灾星只差一步。而且几乎必然演变成大灾星。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那些打着反独裁、要民主旗号夺得政权的人，会建设起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极权制度？为什么大跃进会变成大饥馑？为什么“一穷二白”会产生“一大二公”？为什么大饥馑之后，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华民族必须认真反思和直面回答的问题。任何歪曲和隐瞒历史真相的企图，都是别有用心和祸国殃民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动机是夺回在党内渐次失去的各种优势（包括思想优势、组织优势、法理优势等等），巩固和加强其个人独裁的地位。他利用中国社会深入骨髓的神权政治思想资源，却打出了反传统的思想旗号；他利用人民群众对政策灾难和官僚体制的不满，把自己打扮成民意代表，用以打击体制内对其政策不满的官僚群体；他利用中国社会权力拜物教的所有社会资源，掀起了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的狂潮。而人民群众中对官僚体制不满的人群则利用“文化大革命”这块金字招牌，揭竿而起，“奉旨勤王”，这种“勤王军”像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勤王军一样，几乎无一例外地各怀异志，这就产生了所谓“可控的文革”和“失控的文革”，“官方的文革”和“群众的文革”。从而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失范的社会，唯一流传有序并顽固发展的就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权力拜物教文化。

文革中，“一月革命”后官僚阶层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受官僚阶层操纵的

保守派中的一部分人揣摸毛泽东深心的意志，根据自身的政治经验，用“镇压阶级敌人”的“暴烈的行动”来证明自身的正统性、纯粹性、革命性，成为那个时期中国的普遍现象。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只要“政治正确”，哪怕伤天害理也不会受到追究。而对早已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的“阶级敌人”及其家属施暴，是最没风险和最具符号意义的革命行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只不过是普遍现象中的一个典型案例罢了。

个人崇拜狂潮所制造的人神与犯下大量反人类罪的元凶被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可以证明中国的神权政治文化与“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是何等根深蒂固，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充分体现着中国人政治文化的诡异性质，“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只取了它的四个字“阶级斗争”，便与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密切相关。现在回过头来看人类历史，没有任何一种哲学与理论能比斗争哲学、阶级斗争理论所制造的罪恶更多，对人民造成的灾难更深重。

在当今世界上，中国被看成是一个最难读懂的国家，中国之所以成为最难读懂的国家，是因为元规则与潜规则始终占据着实际的主导地位，这种规则已深入到文化血脉中，形成了一种历史文化机制，并因此形成许多隐秘的结构。如隐秘的文化结构、隐秘的观念思维结构、隐秘的社会机制，以及由这些隐秘而导致的中国人的隐秘文化心理、文化人格，文化性格结构，许多隐秘的系统结构纠缠在一起，使中国人生活在一种公开秩序与隐秘秩序的纠缠中，明规则与潜规则的纠结中，这是一种现实生活与历史文化的纠结。致使当今世界上很多简单明了的事物、观念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当政者口里说出来马上就变得幽暗晦涩、非驴非马。

1978年我第一次到道县，杀人事件已过去11个年头，给我印象最深的道县风景是潇水边一排排的竹丛，像漓江边的水竹一样清荣俊茂、密不透风，青砖黑瓦的典型江南民居村落就掩映在这竹幕后面，喀斯特地貌在这方土地上发育出一种别样风情，清澈澄碧的江水，横着孤舟的野渡，游走着农夫浣女，牛羊鸡犬的田间小路，一切是如此恬静美丽。联想从这里走出来的大思想家周敦颐，大书法家何绍基，以及先祖从此地迁出的鲁迅，我怎么也不明白，神姿仙态如情似梦的山山水水，怎么会产生如此匪夷所思的血腥暴行？尤其是阴雨天，雨雾笼罩的层层竹幕后面是死气沉沉的村庄，一种神秘的死寂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时一种莫

名的恐惧感就会攫住你，这一切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到底藏有怎样神秘的玄机？国外的许多学者将苏联的极权统治称为铁幕，却不约而同地将中国的极权社会称为竹幕，其中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随着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探究和思索，许多影响到中国人观念根源的文化密码被破译出来，终于对中国人文化的诡异性有了相当的认识，西方的现代极权意识形态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杂交，现代极权体制与传统集权体制的对接，产生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极权体制，其泛政治化的程度更复杂，其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更强劲，而且神权政治的个人崇拜狂热也更疯狂更盲目，历史的神秘与文化的诡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令人难以读懂的国家，正是这种历史文化深远神秘的诡异，使竹幕比铁幕更具生命力，更难判断评价，因而更具有欺骗性。

秦汉之交时期黄石公曾对秦政有过一句高度精辟的评判，那就是“残亡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这种评判用来评判现代秦政仍是那么的恰如其分。结合当下铺天盖地空前绝后的贪腐大潮，结合一个复合性危机开始集中爆发的碎片化过程初露端倪，我们已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有一种盛世华章叫回光返照！

【争鸣】

## 视 角

## —关于文革受害者闻佳争论之我见

章无忌

闻佳，疯癫在自己世界里，永远不可能再知道，为着近半个世纪前她花季少女时所遭受的屈辱苦难，她的同班同学正与一个陌生人在《记忆》上论战不休。

那个陌生人叫童话，他读过《顾文选》后，悲悯文中提到的闻佳的遭遇，开始采访这个女孩当年的老师、同学、亲属，求索档案材料，撰文《为无告的闻佳》向师大女附中九十周年校庆投稿。他的文章让人们知道，<sup>1</sup>1966年，在这所著名的中学，不只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还有个初中三年级的女学生，仅仅因为一句“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而被揭发、被批斗，甚至，被逼疯后还扣上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sup>2</sup>投入监狱长达11年！

让人意想不到的，童话的文章引来闻佳初中时的同班同学鲍国芳的不满和指摘，她认为童话不尊重历史，还中伤了自己当年的班主任。

但，即便是鲍国芳在指摘童话的文章里也不得不承认童话文章前面“对事件的叙述是清楚可信的”<sup>3</sup>。

既然童话对事实的叙述真实可信，那么即便他在引用别人文章时<sup>4</sup>，出现了些许错误，鲍女士诚恳地指出来就好了，何必对同情闻佳的从无恩怨的陌生作者这么反感呢？

在如火如荼的1966年，在高干子弟云集，得运动风气之先的师大女附中，在6月22日就开始武斗校长、老师，并在8月5日打死卞仲耘校长的这所著名学校里，鲍国芳说，闻佳所在班级“没有发生过同学批斗老师，或者批斗同学的事件，而且也没有同学被称作什么狗崽子，当然也包括闻佳”。<sup>5</sup>

原来在这所学校中居然有这样一片净土，有这样齐心、理性、睿智的一群老

<sup>1</sup> 童话：《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记忆》总第49期36页，2010年5月23日。

<sup>2</sup> 鲍国芳：《尊重历史真实是最起码的》，《记忆》总第50期33页，2010年6月6日。

<sup>3</sup> 同注释2

<sup>4</sup> 童话引用了王友琴《顾文选》中的关于批斗闻佳的描述，《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记忆》总第49期36页，2010年5月23日。

<sup>5</sup> 同注释2

师和学生，这不能不让读者感叹或者疑惑。

为了证实此说不伪，鲍国芳拿出了一张闻佳也在其中的1967年底的同学合影，说明闻佳没有遭到同学的迫害，然而定格在一瞬间的照片又能说明什么呢？正如鲍女士说的——这“什么也证明不了”！就像伟大领袖和亲密战友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亲切合影，既不能证实他们是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也无从表示亲密战友怀揣离经叛道的念想，随时准备与伟大领袖分道扬镳。

当童话回应了鲍国芳的指摘后<sup>1</sup>，读者以为此事会划上句号了，毕竟童话“文章前面对事实的叙述是清楚可信的”。<sup>2</sup>可鲍女士又抓住了童话回应时的“小辫子”，再次指摘童话的文章。<sup>3</sup>鲍文紧紧揪住童话说金元老师接电话时“很慌张”三个字，撇开闻佳冤案的主题，直奔班主任金元的丈夫现在的疾患，做了过多的陈述。

围绕童话写闻佳，旁生出这多枝节，我认为完全是由于童话和鲍国芳的视角不同造成的。童话关注的是闻佳的悲剧，“只想对克服遗忘尽点力量，并寄托对健康生活的一份期望”<sup>4</sup>；鲍国芳则着重于辩白闻佳的同学和老师都没有加害闻佳，自己的良心没有过失。她认为闻佳之所以有后来那样的遭遇是由于这个同班女孩在政治高压下“难免会自己对号入座，出身不好的自然有心理压力”。<sup>5</sup>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从注视事物的视角，不难看到一个人心底的活动。为什么对这样一件争论双方都认可史实的历史悲剧，却没有在进一步发掘施害者上达成共识，这的确是件能够引发思考的事情。

鲍文一口咬定闻佳出事是在她们都离校后的1968年，但那张1967年底闻佳和同学们的合影清楚地证明，这时，已经有闻佳的同学赴东北农垦兵团，那照片是送行前的合影。那么，鲍国芳怎么就能那么肯定，在此之前，闻佳不会说过那句陷自己于无穷灾难的“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的天真的话呢？闻佳又怎么就不会因此被同学抓住话柄上纲上线呢？

联想到该校九十周年校庆，没有采用童话的《为无告的闻佳》，我不揣冒昧地想，经历过文革的一些人正有意无意地在回避自己失败过的良心。虽然，几十

<sup>1</sup> 童话：《回答鲍国芳女士的质疑》，《记忆》总第51期40页，2010年6月15日。

<sup>2</sup> 鲍国芳：《尊重历史真实是最起码的》，《记忆》总第50期33页，2010年6月6日。

<sup>3</sup> 鲍国芳：《关于童话〈回答质疑〉的回复》，《记忆》总80期77页，2012年1月31日。

<sup>4</sup> 同注释1

<sup>5</sup> 同注释2。

年后，闻佳的同学想到为无告的闻佳捐款，但这样的举动在曾经缺失的人性面前，不是多少显得有些软弱无力吗？

但愿鲍国芳文中“天下不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因为红卫兵当时施暴搞打砸抢，制造了红色恐怖，所以文革中的全部灾难都来自红卫兵”的表达，只是口无遮拦，一时意气<sup>1</sup>，而不存其他的目的。

---

<sup>1</sup> 鲍国芳：《尊重历史真实是最起码的》，《记忆》总第50期33页，2010年6月6日。

【争鸣】

## 韩爱晶、蒯大富的记忆错位

聂树人

按：本文作者是原红卫兵首都三司宣传部长、《首都红卫兵》报主编、三司核心组成员。

蒯大富在他的《岁月流沙》中回忆道：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言。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在《清华蒯大富》一书的第八章第三节，韩爱晶以“厘清十万人大会前后重要事实”为题，使得历史越厘越乱。韩爱晶写道：

蒯大富回忆说：……大会会有一个议程，就是带领全场十万人宣誓，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韩爱晶把稿子递到我手上，对我说：“蒯大富，你来念吧。”

……

韩爱晶回忆说：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宣誓：会前准备好的誓词在我手上，我觉得井然代表北航“红旗”发言已经很成功啦，我再领誓，北航占得太多不好。蒯大富坐在我旁边。我一想，周总理虽然在清华给蒯大富平反，但他好像还是挺臭的，成立个“井冈山”还不到一百人：让他上去，批反动路线意义更大。我就把稿子递给蒯大富，我说：“誓词你来念吧！”蒯大富接过稿子就上前去了。

因为参加这个大会的人员，相当数量是外地来京的造反派，都以为是中央首长让三司司令蒯大富领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会在北京和全国造成极大影响，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从此，蒯大富个人在清华大学校内政治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

蒯大富、韩爱晶的回忆，错了！错得离奇！！

首先，时间搞错了，蒯大富带领大家宣读誓词，是在1966年的9月6日，

而不是10月6日；其次，是在三司成立的大会上，而不是“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10月6日大会上；第三，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而不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在当时的情况下，往往只是在一个组织成立时，才宣读誓词的。在召开批判会时，是不宣读誓词的。10月6日的大会是“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不可能宣读誓词。

韩爱晶本不是三司的人，他在三司成立大会的前一天，可能参加了二司的成立大会。他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可能参加9月6日三司的成立大会，并把蒯大富“推上去”宣读誓言呢？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江青等根本就没有到场，蒯大富又怎么能见到他们呢？

《誓词》就刊登在1966年9月6日以后出版的第一期《首都红卫兵》报上，与韩爱晶有什么关系？“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这话从何谈起？

有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去查查《首都红卫兵》报创刊号，看看誓词的原文。

由于“回忆错位”，无论是蒯大富，还是韩爱晶，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由三司主持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集会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

1966年10月9日《首都红卫兵》报对10月6日大会的报道说：“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广西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

这里没有写“地质东方红”代表的发言，也没有写“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陈育延的发言。那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地质东方红”和“清华毛泽东红卫兵”属于三司，是大会的主人，而不是如“北航红旗”和“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是“外人”。因此，不能因为“北航红旗”的井冈山在大会上发了言，就被说成是三司与“北航红旗”联合召开的大会。更不能说，因为“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在大会上发了言，就说成是三司与“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联合召开的大会。

几十年后的21世纪之初，“北航红旗”有人“回忆”说，这次大会是他们和三司“联合召开”的。这算是“投石问路”。后来，蒯大富在他的《岁月流沙》中又做了如上的回忆。



因为不值一驳，即没有引起质疑，错误的记忆就被当成真的了。2011年，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就进一步写道：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10月6号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在北京市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的。地质周永璋坐主席台。在工人体育场，坐满十万人。

韩爱晶回忆说：……1966年10月6日，北航“红旗”和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共同组织了一个十万人大会。当时“三司”主要负责人朱成昭派人和我们一起做组织工作，但他想不到会议开得那么隆重，那么成功。会议程序、发言、誓词，请中央领导等，这些环节，主要是我们北航“红旗”落实的。

准备工作只有几天，我、井然（文化革命时原名井冈山）和姜允珍同学在办公室起草发言稿、誓词等，五系张庆海等做了请柬，写明请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我们拿着请柬就打电话联系《解放军报》一个叫宋立形的记者，他非常重视。他向《解放军报》领导汇报了我们的开大会的事，宋立形和《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开小车专门来北航听取我们关于召开十万人大会的情况汇报。他们满口答应，说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请中央首长。

10月6号，我和井然提前赶到工人体育场，北航“红旗”战士都安排在离主席台正面最近的位置。看着会场很快就坐满了十万人，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不安，高兴的是会场很热烈，大会基本可以成功啦！紧张的是，中央领导会不会来呢？

忽然掌声四起，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和张春桥等笑容满面，一边高举双手面向会场鼓掌，一边走到主席台坐下。

大会开始，北航“红旗”代表井然第一个发言，他那超宏亮的声音和充满革命豪情的发言，激起全场热烈掌声，周总理等频频微笑点头。后来陈伯达、江青只讲了几句话，张春桥宣读《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重点是周总理讲话。

请看，蒯大富、韩爱晶对“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10月6日大会这件事，情节写得多么详细！时间、地点写得多么准确，参加的人有名有姓，场景是多么宏大，会议开得多么有声有色！

可是，我要说，除过“北航红旗”的井冈山在大会上发言这件事情是事实外，其它都是又一次“记忆错位”。其理由如下：

第一，自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文革的依靠力量。他先是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8月1日），后在中南海西门接见群众，号召群众“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50万红卫兵大会，继后又支持成立“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

经过两个多月的选择，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中，选中了弱小的三司（当时只有3000多人），而不是当时还“兵强马壮”的一司和二司（都达几万人）。

1966年10月6日，毛泽东派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参加由三司主持召开的大会，对三司给以强烈的支持。

10月6日以后，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三司很快发展壮大。相对于其它两个司令部的衰落，三司却一枝独秀。这个政治背景，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其次，三司，是中央承认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之一。而北航红旗，只不过是一个参加了二司的群众组织。也就是说，是一个次一级的群众组织。一个次一级的组织和一个高一级的“超级组织”三司“联合”搞活动，是不对等的。因此，是不成立的。

第三，以“地质东方红”经过一进、二进地质部的磨练和胜利，以陈伯达派关锋、戚本禹于9月23日支持“地质东方红”夺权，以周总理9月26日接见三司全体战士表明，造反派的处境正在逐渐好转。特别是，以当时三司负责人朱成昭的“刚愎自用”，他会去找韩爱晶商谈“联合”召开大会的事情？在串联筹建三司时，朱成昭等人曾经去找过“北航红旗”，希望他们不要参加“保守”的二司，而与“地质东方红”一起组织成立三司，但是遭到拒绝。时间过去不过两个月，朱成昭岂能忘记？

从朱成昭的工作作风上说，他只管大事，只管大政方针。即如三司，自成立之后，朱成昭就很少到三司去过，将三司的大小事全盘交给了周永璋和其他人。以至，连9月26日周总理在工人体育馆接见三司全体战士，10月6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他都没有参加。对于三司主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事，朱成昭也根本不可能亲自去北航与韩爱晶联系。

第四，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事先成立有会议筹备组。这个筹备组就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司司令部。当时，三司各部门主

要负责人都参加了筹备工作。我负责的是宣传组。此外，还设立了大会联络组、保卫组、后勤组、办公室等。这些组，都与“北航红旗”没有半点关系。如果是“联合召开”，请问韩爱晶，你们谁参加了大会筹备组？

又请问，如此重要的大会，怎么能由韩爱晶在“北航红旗”的办公室决定事情？

又请问韩爱晶，你在1966年10月初，是不是“北航红旗”的第一把手？据戴维堤说，那时，你好像还不是第一把手。如此，你又有什么资格对10月6日的大会说三道四？

第五，在1966年9月中下旬，三司已经与中央文革小组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曾经举办过几次有三司负责人参加的形势座谈会，或者单独与三司负责人座谈，才有了《红旗》十三期社论。到了10月1日，三司的王大宾和我等几十个人，才能上天安门，受毛泽东的接见……

当时，为解决交通问题，给三个红卫兵司令部派“汽车班”，就发生在9月，是中央文革决定，由北京军区派的。当时，周总理、刘志坚、郑维山等，都到文化宫三司司令部来过。刘志坚、郑维山还不止一次来过。

在这个过程中，难道三司还没有建立起与中央文革的联系通道，而要由“北航红旗”通过《解放军报》去探询？也就是说，对于送请柬这样的事，三司完全可以直接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联系。

当时，“请柬”在大街上都能买到，用不着自己去做。事实也是，当时，9月6日三司成立大会，9月26日周总理接见大会，我们都是在大街上买的“请柬”。召开10月6日的大会，也是如此。

还想说一句：当时给中央首长送请柬，是连毛泽东、林彪都要送的，要想得尽量周全。但是，还是有想得不周全的地方。以致10月5日傍晚，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来到三司，说中央要参加会议的，还有两三个人，我们没有送请柬。他要我们立即把请柬“补上”。听了这个消息，我们很高兴。这说明，明天中央首长肯定会来参加会议。

退一步想，难道三司就没有能力主持召开一次大会，而要与二司下边的北航红旗“联合”？在工人体育馆，9月6日召开成立大会，9月26日召开周总理接见大会，都是三司独立主持并完成的大会，并没有与谁“联合”。

第六，10月6日大会召开时，三司负责人朱成昭没有到会，大会执行主席是周永璋，大会司仪是三司所属院校派驻三司的一个核心组成员，好像是政法学院的张广海。代表“地质东方红”在大会上发言的，是王大宾，代表“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大会上发言的是陈育延。如果是“联合召开”，“北航红旗”必然要在大会上占有一个主持大会的席位，至少，它会争得在大会上“露脸”的其他角色。可是，在大会的自始至终，除过井冈山发言外，人们看到过“北航红旗”人的影子吗？

蒯大富的回忆是“地质周永璋坐主席台”。我要说的是，坐主席台的人多了。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至少可以坐一百多人。我就坐在主席台第二排的正中（前排是中央首长席）。

第七，在10月6日以前，三司还是一个只有三千多人（“地质东方红”就占了一半多人）的小司令部，既没有权，更没有势。比起一司、二司几万人的队伍，比起在学校“掌着实权”的保守派队伍，三司实在不值一提。此时，“地质东方红”和加入三司的其它院校，正在与校内保守势力进行着殊死搏斗。9月下旬，“地质东方红”同“伪文革”展开了殊死搏斗，“查封院文革”，夺取广播台，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以至流血事件。9月23日，陈伯达派关锋、戚本禹到地质学院，对“地质东方红”给予大力支持，才稳定了局面。周总理在9月26日接见三司全体战士时，还在说着不要怕自己是“少数派”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北航红旗”负责人能看得起三司？能与三司“联合召开”一次会议？就三司来说，能从其他两个司令部的参加者中，挖出一两个组织参加三司的大会，肯定是自己的胜利。

第八，“北航红旗”是成立才一个月的二司的成员。“北航红旗”不以二司的名义在社会上活动，不力图发展壮大二司的组织，是为什么？它脱开二司，独自参加三司的会议，又是为什么？

第九，前文已经述及，蒯大富带领大家在大会上宣读誓词，是9月6日三司的成立大会，而不是10月6日。在《首都红卫兵》报对10月6日会议的报道中，除主要内容外，只写了“通过了给我们最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和大会通电”，并没有提及宣读誓词的事情。在这样的大会上宣读誓词也不合适。

韩爱晶“煞有介事”地说，他临时起意，让蒯大富宣读誓词，又从何说起？

一个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有严格的会议议程、会议安排，岂是在会议召开过程中，可以随意改变的？退一步说，难道“联合召开”的会议，就由韩爱晶一人“临时起意”，随意说了算？

韩爱晶为了绕开他不可能参加三司成立大会这个难题，而故意将蒯大富宣读誓词的时间推后到10月6日。但是，这样一来，他又犯了事态发展逻辑上的错误——蒯大富处境的变化不是自10月6日始，而是自9月6日始。这一点，请蒯大富自己说说，“地质东方红”何时派人到清华去支持他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他的处境是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化的？是9月6日以后，还是10月6日之后？

第十，当时及以后，人们都知道10月6日工人体育场大会是由三司主持召开的，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公开的会议筹备，公开的大会，公开的会议主持者，能有什么疑义？可是，几十年之后，却有人在“厘清”的旗号下改写这段历史了。想想也是，三司主持的大会是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的名义召开的；朱成昭死了，死无对证；周永璋中风了，病人难以表达……

但是，作为10月6日会议的筹备者，我还活着；当年筹备会议的其他人，多数人还活着。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大部分人还活着。这些人都是可以出来为我的上述说法作证。

历史不允许推倒重来，也不喜欢戏说。

由此，我有了一个很不成熟的看法：由“许爱晶”执笔的《清华蒯大富》，其他部分的所言所写，难道也是这样，将想当然当作事实？

**【往事】**

按：朱明（1917年—1961年）原名王钧璧。安徽省嘉山县（今明光市）明光镇人，林伯渠先生的最后一任妻子。1930年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1937年从上海赴延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中成为被改造好的正面典型。1943年与比自己年长33岁的林伯渠结婚，林伯渠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1949年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朱明就职于中央组织部，后调动到中央纺织工业部监察室。朱明在1954年3月（此时朱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以向江青投递匿名信的方式详细指明江1930年代在上海入狱变节问题。该匿名信案件经毛泽东默许被立为“第18号案件”，指定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挂帅侦破。

1960年林伯渠去世，1961年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林伯渠死后的遗留问题。经有关部门查对笔迹，确认匿名信为朱明所写。朱承认后即自杀。1967年，已去世近6年的朱明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反革命分子”，粉碎“四人帮”后被平反，恢复名誉。

本文作者是朱明的表弟，北京市眼科研究所研究员，纽约市大学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现退休，居北京。作者是在抗战前后、解放后与朱明本人有过直接接触的仍在世的亲属。

**回忆大表姐朱明二三事**

李平余

自从《王芳回忆录》于2006年9月由浙江出版社出版，并披露中央“18号案”的详情后，有关揭发江青第一人，林伯渠夫人朱明的报道，就不断地出现在不同媒体。但是，对于朱明的家庭情况，均语焉不详。

**朱明的外祖父，就是我的祖父**

关于朱明的家庭情况，她在延安整风中，对剥削家庭的批判“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一文，载于《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该书由延安中央党校整

风运动组编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唯一能够找到的公开发表的材料。

她在发言中说：“我的父亲兄弟又多，我母亲因为受伯母欺负，被外祖父接回自己的故乡。父亲当时在北平读书，后又入保定讲武堂，毕业那年正要往广东去出师，外祖父把他叫回来。从此，他就和舅父们经营农业等业，主要还是依靠土地。外祖父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式的书香门第，代代读书，做官的少。所以我的舅父们都是学农、工、医的，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灵飞经》，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谓是3岁念唐诗，12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父亲他们也经营过面粉，后因洋面进口过多，影响破产，非常困顿，天天躺在椅子上拼命地抽烟。”

她的外祖父就是我的祖父，名李业新，字鼎候，晚清廪生，<sup>1</sup>生于1866年，1938年卒于重庆。

我的故乡是安徽省嘉山县明光镇（现安徽省滁州市明光市）。

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有说朱明是安徽定远县人，也有说是嘉山县明光镇人。正确的说法应是：朱明的祖籍是安徽省定远县，在嘉山县明光镇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后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并投奔革命。

我的祖父生有三男四女。其中，二女儿，也就是我的二姑，嫁给安徽省定远县的王培福，字介五。二姑育有一女，一子，朱明是她的大女儿，乳名大毛。

由于二姑去世很早，我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

母亲早亡，也是朱明幼年在明光外婆家度过的重要原因。当时李家富有，王家较穷。在我爷爷的关照下，朱明的一切待遇都和李家的姐妹完全一样。在朱明的成长过程中，受李家的影响更大一些。我二姑去世后，王培福再娶，生有二男三女，朱明的二弟已经去世，其他健在。虽然我二姑早已去世，但是，李王两家的姻亲关系保持至今。

### 朱明是我的大毛姐

朱明是我的众多姐姐中，年龄最大，身材最高、最漂亮的一个，我们小时候

---

<sup>1</sup> 秀才中的第一名。

叫他大毛姐，长大以后改叫大表姐。李家在明光主要经营田园和地产，兼营工商业，如粮行、酒厂、烟店、浴室等。

我出生于1933年，4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全家逃难到重庆。老家留给我的记忆已经非常淡薄和模糊。朱明说：“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谓是3岁念唐诗，12岁看《红楼梦》的角色。”根据我从父辈和兄弟姐妹们的嘴中了解到的情况，她说的大体是正确的。那是李家在上世纪20到30年代的全盛时期。由于祖父是读书人，家中非常重视教育，朱明说：“所以我的舅父们都是学农、工、医的……”。朱明有三位舅父，大舅父是我的父亲，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二舅父在家乡管理产业，后为当地著名中医；三舅父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眼科医生。这就是朱明说的“农、工、医”。

30年代，朱明和我的三叔、大姐和二姐（堂姐）均在上海接受高等教育。当时有一股潮流，明光的有钱人都把子弟送到上海念书。明光人在上海参加革命的著名人物，除朱明外，还有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原中顾委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明光是一个小地方，到上海念书，家里没有钱是办不到和不可能的。

朱明在上海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记得堂姐淑玮对我说过，那时她已经参加进步活动。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晚上经常到二姐淑瑜（我的堂姐，也在上海读书）的宿舍里借住。

### 又见大表姐是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庆

我再次见到大表姐，是1945年，在重庆。当时父亲在重庆柏溪资渝钢铁厂职员食堂当管理员。全家住在厂内的职工宿舍。有一天，堂兄平济，突然把一位身穿深黄色皮大衣的高个子妇女领到家中，她就是朱明。8年后在异乡重逢，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此前，家里已经知道朱明到了延安，并且与共产党的高官林伯渠结婚。

她说，为了治牙，随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到重庆。晚上（或者中午）全家围在一张方桌周围吃饭，给朱明接风，母亲做了不少家乡菜。

谈完家常之后，争论起共产党的政策，大约涉及土改问题。父亲和朱明争论得很凶。我那时12岁，听不太懂，只记得朱明说：“大舅，我说不过你，我可以



请周恩来先生和你谈“。父亲思想反动，当然不敢去见周恩来，此事不了了之。

晚上，为了安全起见，安排朱明住在工厂外的农村，我的三婶家。三叔到重庆后，在几个医院任职，天天挤公共汽车，1941年挤车时，在车门口被挤下车，后脑着地，当场死亡。留下一男三女，三婶整日以泪洗面。

翌日，朱明从农村回到重庆，把三叔的两个女儿带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大女儿淑萍，当时9岁（毕业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学院，现退休在北京）。二女儿淑娴，当时8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居住在美国）。他们在重庆中共办事处住了1个多月，直到朱明离开重庆回延安。

### 我的大表哥

朱明在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阶级烙印时说：“至于交朋友更加阶级分明。记得弟弟小时喜欢一个男佣人，因为他在第一次欧战时去法国当过华工，会骑马打枪，所以弟弟非常喜欢他。弟弟把父亲的酒和烟偷送给他，下午放学回来总是跑去找他。有时跟他学骑马打枪、有时他在园子里锄草或是栽花种菜，弟弟总是帮助他，给他拿铲子或是找喷壶，非常愿意帮助他，听他的指挥。后来，父亲知道了，非常气愤，叫弟弟跪在地上，父亲手提着鞭子，也把我们叫过来站在旁边看。并问我们，你们说这个下流东西要不要打？我们心里同情弟弟，但又怕父亲，当然只好讲应该。于是父亲就用力地抽，打人的是父亲，被打的是弟弟，这样的教育对于我又怎能不受影响呢？所以我说我的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份。”

朱明在这里说的弟弟，就是他唯一的同父同母的弟弟王均寰，字晋韩。我们叫他大明哥（他小名叫大明），后来长大了，改叫大表哥。大表哥在抗日战争时，为了打击日寇，投笔从戎，考入国民党的军官学校。解放前夕，任国民党装甲兵某部连长，驻扎在江南某地，正准备随军到台湾。此时，他接到朱明的来信，要他脱离国民党军队，等待解放。他根据姐姐的意见，脱离了国民党军队。

解放后大表哥在北京工作，先在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任调研员，曾在朝鲜战争期间赴朝，担任翻译。后在农业部工作。他在北京的家，就是朱明和明光亲戚见面的地点。上世纪50年代，我母亲和二叔到北京，都是在大表哥家和朱明见面的。我于1955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从南京到北京，常参加这样的会面。

### 解放后在北京见到大表姐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一次会面，大约在1959年。四姐淑玮来京，我和四姐陪大表姐游景山公园。在景山上，我们谈了很多，首先她为林老太忙不能见我们，表示歉意。然后从老年人的养生、粮食短缺、中南海的食物分配，一直谈到我父亲在台湾的情况。

父亲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于南京解放的当天，匆忙出逃。经杭州，上海，广州，到台湾。我大哥解放前夕毕业于国民党空军通信学校，随即到台湾就职。父亲初到台湾时，通过香港的朋友，和大姐有信件来往。1952年肃反运动后，断绝一切联系。大表姐对我们说：“大舅在台湾的生活没有问题，又结婚了，我已经托人动员他回来。”

这些情况对我们家非常重要。基于大表姐当时的地位，对于她的话，我们确信无疑。最大的影响是，引起母亲的极大不快，失去了生活的动力，1961年病逝于南京。

改革开放后，在大哥和坡多斯教授的帮助下，我于1982年到美国，在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眼科任访问学者，后任客座教授、兼职教授，先后共11年。1982年父亲病重，我申请到台湾探亲，受国民党当局的阻扰，未能成行。父亲病逝后，大哥和大嫂于1983年到纽约来看我。见面后，自然谈到大表姐对我们讲到的情况。大哥说，确实有人到家，动员父亲回大陆。他们既未向当局检举揭发，也没有回大陆的行动，不了了之。至于父亲再婚一事，事出有因，系张冠李戴。我大嫂的父亲在台湾再婚，情报人员误报成我父亲再婚。父亲是坚定的统一派，大嫂对我们说，他对家里买冰箱等电器一概反对，理由是明光没有电，将来回去用不上。2004年，台独闹得凶，大哥提议，把父亲在台北的墓和母亲在南京的墓合并，改葬在北京，全家一致同意。在合葬仪式上，大哥的儿子宽义，特别对奶奶说，祖父对她的爱情始终如一，在台湾再娶的事，是绝对没有的。总算了却了大表姐的不实情报，对母亲的伤害。

### 最后一次见到大表姐

林伯渠老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随后接到朱明的通知，要我参加林老的追悼会。1960年6月3日，我和三姐淑珂先到大表哥家集合，然

后坐专车到中山公园中山堂，作为家属参加了林老的追悼会。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大表姐。

1961年，听大表哥说，大表姐服安眠药自杀。他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只说在处理后事时，他对中央有关同志说，大姐的骨灰能进八宝山，就进，不能进，我就背回老家去。朱明的骨灰至今存放在八宝山。

关于朱明的自杀，家属中有各种猜测和说法。直到《王芳回忆录》出版后，才知道真相。我们都为大表姐敢于坚持真理，用生命去做她应做的事，感到自豪！

### 另一位表哥

朱明的二弟王军璠，解放后参加解放军，一直做到通信兵少将。我曾经当面问他，是不是和大表姐有关。他回答说，没有，完全靠自己努力。对此，我们很多亲属半信半疑。《王芳回忆录》出版后，我们相信军璠说的是大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知道军璠是反革命分子朱明的弟弟，升迁绝无可能，开除军籍是必然的，还可能被送进大牢。

和朱明同时代的亲属，如她的大弟，我的两位姐姐，都已作古。我的回忆不全面，错误也在所难免，请知情人补充纠正。

2010年8月12日

## 【往事】

## 老彭，你魂归何处

徐 罗

老彭，个儿矮，约 1.56 米左右。面黑，稍胖，戴一副黑边眼镜。与我在同一中学教书。

听同事说，她在解放前读书时，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后，她嫁给了一位革命老干部，为了照顾好老干部前妻所生之子，她在怀孕后，做了人流，自此一生再未生育。

1966 年，她与我在同一年级任课，她是俄语教研组长，我是一名年轻的数学教师。我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住在一间不满七平米的只有一床一桌的教工宿舍里。小屋的门口，紧邻着洗衣洗菜的自来水池。每天清晨，在洗漱声、说话声中醒来，晚上在“哗，哗，哗”的水声中入睡。孩子的爸爸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教书。

也许是她没有孩子，我那未满周岁孩子的纯真、可爱吸引了她；也许是她寂寞孤独，常常来和我聊天。有时聊聊孩子，有时聊聊班级学生情况，有时聊聊家长里短……。我们虽年龄不同，所教学科不同，却成了比较接近的朋友。

那场“始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打乱了。学校停课了，到处都是穿军便服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派”，但是谁是牛鬼蛇神？谁是走资派？迷茫充满人们的双眼。在全国，一时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联动”，在我校成立，一切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那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出笼，进入校门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师生要低头站在旁边；校长，主任，一些老教师……被轮番批斗。老彭是老党员，显然，她的政治嗅觉比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敏感得多。一天，她将我叫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运动会发展很快，可能很多人会受冲击，你的家庭出身不好，万一要“有事”你到我家去住，我家是老干部，可以照顾你和你的孩子。望着这位非亲非故的同事，无私的友情强烈震撼着我。一个柔弱的孤身女子，在疾风劲雨中，有一个可以依身的小小港湾，那种温暖真是无以言表。

一个一个的“走资派”被揪出来，一个一个的“牛鬼蛇神”被揪出来，胸

前挂着牌子，被批斗，被游街，被鞭打。几个出身工农兵的学生和教师，成了学校“革委会”的掌门人，掀起学生斗老师，老师斗老师的风暴，迷茫，不安，恐惧充满校园。

一天，革委会突然通知召开全体教工大会，一位身为革委会委员的年轻教师，声色俱厉的宣布：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会，把封、资、修的东西揭发出来，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揪出来。个别积极分子揭发某某教师在课堂上讲“帝王，将，相”，某某教师作风不正派……，这些似是而非的话语，使会场上坐着的教师，个个心惊胆战。突然。我的指导老师，一位年事已高的特级教师，被拉上台，要他交代在课堂上宣扬封资修的罪行。老先生吓的浑身发抖，结结巴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他的每一节课我都听过，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数学以外的话，我怀着极其不安的心情默默地坐着。时钟一分一秒地过去，气氛愈来愈紧张。会议主持人又在喊：“现在阶级斗争很激烈，阶级敌人就隐藏在我们中间，自己站出来，算投案自首，否则就要把你揪出来打入十八层地狱”。会场鸦雀无声。恐怖的气氛笼罩全场。“我数十下，如果不站出来，我们就把你揪出来。一，二……”，人们快要窒息了，只见会议主持人走了几步，一把将一位老师揪到台上，我抬头一看，惊呆了，竟是老彭！“她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阶级敌人。解放前，她是三青团，打入地下党，破坏我党的地下工作。老实交待你的罪行！”只见老彭高声喊道：“你们搞错了，我根本没有参加过三青团，我从来没有做过对党不利的事。”“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不交代问题，绝没有好下场！”老彭倔强的抬起头，不停的高声喊：“你们搞错了，你们搞错了，你们可以去调查。”直喊得声嘶力竭。主持人最后宣布：“把她带下去，打入劳改队，不许回家，交代罪行。”此后，一场接一场的批斗会，老彭成了死不交代问题的顽固分子。在每天清晨和晚上，可以看到带着死灰脸色，愈来愈消瘦。佝偻着背的老彭，拖着一把大扫帚，吃力地在厕所，在楼道打扫卫生。一天晚上，听见人们在偷偷传说，老彭的老革命先生也被隔离审查，她抚养长大的儿子，也不认她为娘了。另一位老师说，听说有人自杀了，不知是不是老彭？整个晚上我不能成眠。一个女人，为了照顾革命后代，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对我这个非亲非故的同事，敢冒风险给予关心，她在我心中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无论挨饿，挨斗，挨打都死不承认是反革命的人，真的是反革命吗？怀着焦急万分的心

情，天未大亮，学生们还没到校，我到校园各处及各个厕所去找，老彭还在吗？终于在一条又长又黑的小通道上看到正在扫地的她，我左顾右盼，确定四周无人，揣着狂跳的心，快步走到她的面前，小声地说：老彭，要不你就承认了吧，免得受这样的折磨。她可能没有想到，这时会有人和她说话，惊恐地抬起头，看到是我，急急地说：我真的没有问题，让我承认什么？两眼突然充满泪水说，你快走，别让人看见你和我说话。谢谢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两个月后，传来了她去世的消息。据说是病死的，满身伤痕的她，死在劳改队的房间里，死后也无人来收尸。

若干年后，我终于调到上海工作，一家四口团圆，有了一个真正的家。又过了若干年，“四人帮”倒台了，那场“革命”结束了，学校恢复上课，人们开始了正常的生活。我问在北京的原来学校的老师，老彭究竟是不是反革命？他们说：“她的先生死了，她也死了，她又没有孩子，有谁去给她讨个说法？”当年，既没有哪个部门正式给她定成反革命，现在也就没有人为她平反，她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虽然四十几年过去了，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在我身处逆境、孤独无援时，曾愿意帮助、给过我温暖的人，在她自己身陷囹圄还怕连累我的人，我忘不了最后看见她的那双充满无奈、委屈的泪眼。老彭，你的幽魂在天国的什么地方呢？

2007年9月 初稿

2010年5月30日

修改于美国达拉斯

**【问答】****《记忆》“问答”专栏：**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于贵刊编委或了解内情的读者，性质属于“澄清事实”一类的。我身边有两个材料，其一为《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其二为《人民大会堂大事记1959—1989年》（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编印，1989年5月）（潘家园买的，共758页，编写说明说是“本书为未定稿”）。在她的讲话里，江青说“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这也是我们过去都比较常见的说法。可是《大事记》是这么说的：（1966年7月）“十二日：下午，一一八厅，毛泽东会见比兰德拉·沙阿”（第155页）。“十七日：下午，一一八厅，毛泽东会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及国际组织观察团”（第156页）。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无人能解开这个谜吗？主席那几天到底在哪里？  
布礼！

瑞典 隆德大学

沈迈克

2012年3月2日

**卜伟华的解答：**

毛泽东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之后于7月18日回到北京，此事为众所周知，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周恩来年谱等书籍中都有记载。《人民大会堂大事记1959—1989年》一书中所记7月12日和17日两事均有误。

1966年7月13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消息：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同他进行友好的谈话。同时被接见的，还有随同王太子来访的喜马拉雅·沙阿亲王和他的夫人普林塞普·沙阿公主，以及其他随行人员。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人。

这条消息中没有说毛泽东是在什么地方接见尼泊尔王太子的，但在同一版紧接着的一条消息是：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和夫人石斌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了宴会。由此可见，毛泽东接见尼泊尔王太子是在上海进行的。

1966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消息:毛主席接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和观察员。这条消息也没有说毛泽东是在什么地方接见的,但在7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湖北省副省长韩宁夫欢宴亚非作家。这样也就等于告诉了我们,毛泽东接见亚非作家是在湖北武汉进行的。

### 余汝信的解答:

兹将毛泽东1966年6月28日到武汉,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的材料,列举如下: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419-1422页记载:“(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赴武汉。”“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七月十六日,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余注:新华社在7月24日毛回到北京六天后才发了电讯),“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他已经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9页记载:周7月11日飞武汉陪毛泽东接见尼泊尔王太子(余注:此次接见新华社7月12日发了电讯,但没有透露接见地点和时间);第40页记载:周7月11日飞武汉,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

3、武汉东湖宾馆编辑出版:《足迹——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东湖宾馆》(湖北,武汉,2005年1月版),第8-9页“毛泽东下榻东湖宾馆活动内容一览”记载:“6月28日,从湖南到汉,下榻东湖宾馆梅岭1号。7月上旬,在东湖宾馆梅岭1号写‘给江青的一封信’。7月16日上午,乘船检阅武汉群众横渡长江,11时,畅游长江。7月17日,在东湖宾馆接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及国际组织观察员。”(第42页照片注明接见在东湖宾馆梅岭3号礼堂进行。此次接见新华社当日发了电讯,但没有透露地点)。

4、铁道部专运处编:《铁道部专运处四十五年》(北京,1998),第116-128页“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乘车统计表(1949-1994)”记载:毛泽东乘坐的由12辆车编组的专列,1966年6月6日离京始发(余注:毛此时尚在南方),7月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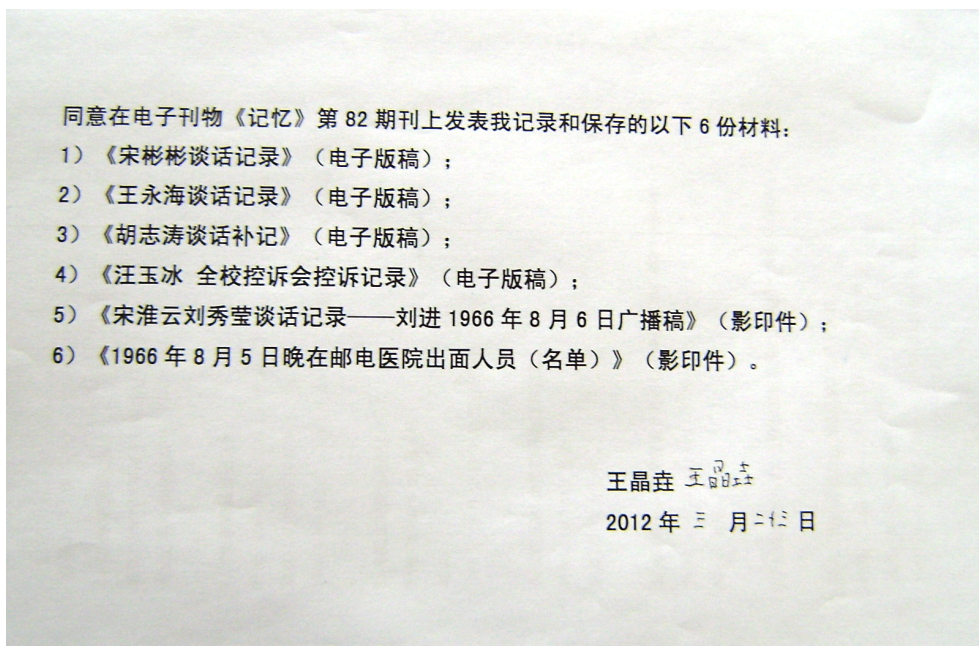
日回到北京。

另外，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原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的《毛泽东在湖北》，都有类似的记载。

惟遗憾的是，关于毛 1966 年 7 月中旬的两次外事活动，人民大会堂管理局 2009 年 9 月出版的《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大事记（1959-2008）》一书，仍沿袭了该局 1989 年编写的《人民大会堂大事记（1959-1989）》中错误的说法。

## 【资料】

按：本刊八十期“北师大女附中专辑三”刊发后，“八五事件”的受害者，卞仲耘老师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将其保存了四十多年的六份材料交本刊发表。这些材料由徐小棣女士等人整理、校对，并由王先生签字确认。除其中的人名外，下面呈现的是这些材料的原貌，即以原件为本，格式、标点、错字、遗漏字、重复字、繁简字，都照原件录入。关于材料中的人名，整理者持两种意见，一是保留原样，二是以XXX代之。经过征求王先生本人的意见，本刊谨取后者。材料中的注释是来自整理者还是本刊编者，请见脚注中的文字说明。



上图：王晶垚先生授权本刊发表六份材料的签字影印件

## 一、宋彬彬谈话记要<sup>1</sup>

66.8.5 後，南营房家中<sup>2</sup>

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

<sup>1</sup> 记，原文如此。应为纪。（本刊编者）

<sup>2</sup> 这一行字，是用铅笔写在题目旁边的，是否与钢笔字记录文字同时所写，待考。如何理解“66.8.5 後”这一时间概念，尚待专家的进一步的考证和辨析。关于谈话的地点，整理者认为，“南营房家中”不是指进行谈话的地点，而是指记录者追记时所在的地点。（本刊编者）

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麼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已快黑了，记不清了。

××和××和××都是临时团委会的。

××当时是少先队辅导员。

革委会我们当时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我们后来到高一去调查。

这个广播有个稿。

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运动刚开始就揭发校领导的问题，也没有很具体的讲。当时认为胡的问题比卞的问题大，是掌实权的，而且卞有时从市委开会回来。还让她领导。可是工作组一进校矛头就转了，认为卞是总支书记，是头。于是就专门开了一个栏揭卞的问题。

六月十三日批判会后，工作组梳了一条辫子八大罪状。当时我们认为这些还不能足以说明能罢官。后来到六月二十一日会不久前。张世栋<sup>1</sup>喜出望外地对我们说现在有可以罢官的材料了。我们问他是什麼，他说是从国务院转来的揭发卞仲耘材料。当时张世栋根本不了解袁<sup>2</sup>是什麼人，听张的口气，好像袁还是党员似的。

## 二、王永海<sup>3</sup>谈话记录

66.11.27（日）上 11:00—下 4:30

66.11.28 上 11:20 东厂一号

王永海，先在楼下门前察看了一阵，看附近还有没有女附中的学生。看到四

<sup>1</sup> 张世栋，工作组组长。（整理者注）

<sup>2</sup> 袁，即袁淑娥。大连工学院俄文教员。1966年5月写万言揭发信诬告卞仲耘。（整理者注）

<sup>3</sup> 王永海，师大女附中工人，文革中失踪。（整理者注）

宝，走到晒台上，就打招呼。四宝告诉我，我到晒台上一看，示意请他上楼，他就到家里来了。王坐下之后，半天没说话，很难受，两眼的眼睑激烈地抖动着，想要哭。……

过了一会他开口说：

卞校长被打了，她身体一直不好，不然也不会死了吧。我一直惦念着四宝，<sup>1</sup>一直想来看看四宝，看看你们一家子。因为我被打成了坏分子，天天参加劳动，也不敢来，怕学生看见。现在学校里搞平反，我们已经解放了一个多礼拜了。今天我到建筑工程部看亲戚去，先来看看你们。

八月五号那一天是这样的：下午三点左右，开始时，先看到有百十个学生把她们五个人叫到一处，后来操场上有四五百学生，让卞校长她们五个人游街，头上戴着纸篓。学生叫我们准备好铁锹，筐子等工具，准备让他们挑土。两只筐子装满了土，有一百多斤，谁也挑不动。后来让他们五人分几处劳动。卞校长不知怎么被带到宿舍楼去劳动的？过了不久（个把小时？），有三四个学生站在学生宿舍门口喊我们，喊我们：“你们把大便（卞）拉走！”我们都怕挨打，哪敢不应。

我们进去一看，卞校躺在大门里边过道的地上。头朝北脚朝南。她身上全是水，满地也都是水。有一股腥味。她的脸已经不象样子了，嘴里不停地在“噗！”“噗！”地往外喷着绿色的沫子。身上的衣服已经不像衣服了，白衬衫变成灰黑色的了。她的鞋子已经不在脚上，是放在脚旁边的地上。我们三个人把她抬起来，很沉，很沉。我们把她放在运土的车子上（前面有两根杠子的人拉的车子），头朝后，脚朝前。我把她的鞋子也放到车子上，鞋子上有大便。

学生指着卞校长对我们说：“你们的主子完了！”又有的学生看着卞校长躺在车子上口里吐沫，又说：“看她在装死！”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到垃圾台（在学校西边大门的北边）上去。我和白松泉两人心里很气愤（陈洪涛已经跑走了），我们不往垃圾台拉，我们拉到东楼总务处门口。我们进去一看，楼道、总务处挤满了人。总务处里，郭主任（郭建华）、刘医生等人都在。（问：李校长（李天翼）在不在？含糊其词地说没看见。），我们问怎么办？没人敢负责。刘医生只是说送医院，但是没人出头送。没人负责，我们两个人怎能送去医院？我们就把人拉到东楼后面院子里我们住的房子前商量，学生觉着人躺在车子上看着寒碜（意即难

<sup>1</sup> 四宝，卞仲耘的女儿。（整理者注）

看)，就叫我们用写大字报的白纸盖起来。我们就跑进屋子里，不敢再出来。

当时我们那个院子正有几十个学生在斗胡志涛、刘致平。后来学生们叫刘致平跪在卞校长躺着的车子旁边。

后来有的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回家，我们说，不认识地方。他们说，你们不会问？有的学生反对往家里送，大概感觉那样推着车子在街上走着不好。这样，人就躺在院子里没人管。

大约过了一两小时，才看见邮电医院大个儿的徐大夫来了。有的老师还给卞校长洗了脸，因为脸上不像样子了。后来，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临走时，听有人说：拿一件雨衣来，用雨衣把人盖起来，从东楼东北面新开的大门抬到对门的邮电医院去的。

第二天早上，学校革委会的广播里说：卞仲耘已经死了。这件事对学校的运动不利，这样做不对，大家不要到外面去说。

后来，我心里一直惦念着，卞校长的遗体是什么时候从邮电医院送走的？是火葬了么？……（看看堂屋里的四壁）家里的样子也变了，原来那么多书呢？（告诉他，那是里边的一间屋子，还没有改变。）……现在四宝怎么样？以前在学校里我常常逗她，我就喜欢逗她玩。……

……

卞校长死后，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感觉是：她是学校里的一家之主，她一死，我们就没有领导了！我们没有领导了！

### 三、胡志涛<sup>1</sup>谈话补记

12.9

1966.12.10 所会议室

#### 8.5 前後的一些情况

8.4 下午，学生到办公室用粗木棒、皮带等打卞胡等五个学校领导干部。卞、胡在同一个办公室，卞被打得很重。胡进行了抵抗，抢凶器。说：有错误可以批判，不应该打人！

<sup>1</sup> 胡志涛，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整理者注）

当天晚上，胡即跑到西城区委去反映，说已经这样打人了，有生命危险。区委的同志记下来了。5日上午胡未上班，跑到市委去反映，市委没人管，又跑到南池子新成立的市委中学文革办公室去，见到一个女同志。他们办公室刚成立，我反映了情况，说有生命安全问题了。她记下了，但她说办公室刚成立，顾不上管。

胡以为卞、刘等都向上面反映了。下午到学校一问，都未去反映。问上午有什么事，说没有。又说：（学生）让我们每人拿扫帚、簸箕到操场去。胡一听，情况不好，赶紧拿起扫帚去打东操场的厕所（规定给胡的任务）。后叫五个领导干部集合时，先未找到胡。后来才找到了。胡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分配给我的任务，打扫完了再去。”去叫的学生愣住了，等她等了十几分钟。胡远远看到一个学生正在给汪玉冰剪头发，看样子，不忍心大剪，只剪了一小绺。

2:30分集合以后，学生往他们身上洒墨水，胡举起手中的扫帚抵挡，结果附近十几个学生的身上洒上了墨水。

让五人头上罩着纸篓在操场上游行，边走边用木棒子打，是谁打的也看不见，（在后面打的，而且头上罩着纸篓）。

接着，就把五人推上学生宿舍楼东头的平台上（爬上一个木梯子），罚跪。胡先不肯跪，说，我不是黑帮。后来去挑土，一百多斤，谁也挑不动，有人还能挑起来走几步。卞转身对胡说：“挑不动，怎么办？”挑不动土，就把五人分开去劳动。胡是由高一三班××领着一批学生监督我们去刷、洗、搬运厕所的厚盖板。胡一次只搬得动两块，××硬叫一次搬四块，边搬边打。我说：“××，叫我搬就搬，不要打。”××说：“不许叫我”，还是打。后来红卫兵集合去开会（红卫兵成立会）。×即把胡交给一批初一初二的学监督。临走时问：你们谁是红五类？大家都不回答。只有一个学生勉强说她是。后来，胡边劳动，她们边打。

胡的腰脊椎骨被打得骨折了，身上多处打伤，腰臀部还缝了两针。在家只能爬在床上，十几天，（不能仰卧）汪玉冰的颈椎骨被打断了，住了一两个星期医院。

学生这次打人，说是要煞煞他们的威风。胡听邮电医院护士说，有的住院病人从楼上病房窗户看到女附中操场上，学生叫一个胖胖的女同志，从很高的跳箱上往下跳，第一次跳下来了，第二次跳下来，就爬不起来了。胡说，卞的内脏大

概坏了。

六点半钟，学生们叫胡去把卞抱起来，说她装死。胡去一看，卞躺在拉土车上，身上压着大板子、扫帚、簸箕、纸，乱七八糟的东西，拉开一看，卞两眼瞪天，口里喷沫，两腿裤子上都是粪便，（那个样子惨不忍睹），（以后十几天，白天晚上，一闭眼就看见她那个样子。）

当时我一看，人完了。我就对学生说，快送医院吧。但是没人送。后来胡坐在屋子里，从窗子往外看。

#### 四、汪玉冰<sup>1</sup> 全校控诉会控诉记录

1967年1月26日

四清一回来，刚到家门口就看见门口贴满了狗窝、猪窝、砸烂狗头……没有进门，一到学校，气氛就更紧张了。

七月二日才知道彭、陆的反党，以后和大家一起学文件（是在四清工作队）。

六日刚回学校就被工作组专了政了。我被放在牛鬼蛇神的行列里。当时我问工作组我算哪一类的？工作组姓于的说我还不知道呢？

对一些年轻的同学的过火行动我可以理解，对工作组的这些不分青红皂白不可理解，把管教学的卞、胡、刘、梅、汪都打成黑帮，这是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吗？

第二天，工作组的人找我，说你在女附中工作了这么多年了，是个老同志了，你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你要揭发嘛！揭校内的。我说上面呢，他说：“也揭，也揭，先揭校内。”所以晚上就揭卞、胡、刘。

马神庙集训的时候，认为卞、胡、刘、梅、汪像猪狗一样。当权派好像过鬼门关似的。凡是刘邓派来的都是压制革命群众的。一句话只许干部老实实在集中营里。

工作组撤走后，又来了革委会、反动对联，对当权派更仇恨了，成了囚犯了。

八月四日，叫我们写工作组是怎样包庇我们的，卞胡刘梅王。用大粗木棒打我们。只好胡乱写，当时桌子的玻璃都打碎了。胡志涛被打的直喊毛主席，又打。

---

<sup>1</sup> 汪玉冰，师大女附中教导处主任。（本刊编者）

6点，在牛鬼蛇神登记簿上写了名字，才许出校门。晚上想啊想啊。

没想到八月五日更大的武斗来了。我被待到操场上的时候，卞、刘、梅已不像人样了。我想我也会变成那样，后来就被剪了头发，背上写了牛鬼蛇神，墨洒了一身。卞仲耘躺在门口已经不行了。后来又罚我去打扫宿舍楼厕所，我头晕眼黑，腰又被打坏了，身体又有病，根本支持不住，我就喝了许多带厕所味儿的水，用小盆子一盆一盆地打水冲厕所。我几次站不住了，可是心里明白千万不能倒下去。厕所打扫完了，走出宿舍楼的时候，看见卞仲耘已仰面朝天地躺在门口，已经不行了。学生又让我去倒垃圾，让我把垃圾筐顶在头上，走上台阶去倒，眼前一片黑，可是我还在想，一定不能倒下去，最后还是是一头晕倒在垃圾台上了。醒来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看着天。后来听到有学生在讲话，才想起今天下午的事情，又听到电报大楼的钟声，知道已经6点了，后来我自己一步步地爬回了家。

到了家里以后，家里的人才帮我把脸上的泥土、浆糊，身上的墨水洗掉。脏一洗掉躺在床上，头上、身上就往外流血，把床单都浸了血，一躺下去，就动也不能动了，脑子昏昏沉沉，一直在流泪。第二天，家里人扶着我到医院去，就住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学生还把大字报、骂人的话往医院里送，医生和护士对我还进行了一些保护。我的脑子昏昏沉沉，什么也想不起来。八月十号，护士给我念十六条，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这回可好了，不会武斗了。十五日，我还看见学校里同学老师敲锣打鼓，就想要能和同学们一起去多好啊！八月二十一日出院了。才知道卞仲耘死了。我就想毛主席说“为人民而死重如泰山……”，我如果死在垃圾台上，真是轻重不分啊！我也被编进劳改队，我是新劳改犯，老劳改犯照顾我，不让我干重的，让我劈柴，可是劈柴也不行，腰支持不住，就没有干。

8月27日下午，第三次挨打，皮带头儿打得心痛啊！打人的不是敌人啊！

我想不出谁在搞鬼，谁在破坏十六条啊。由于我成了黑帮，我的丈夫成了狗丈夫，我的孩子成了狗崽子，而且挨了斗，被赶到乡下劳改。

8月5日毛主席写第一张大字报，也正是我校进行大规模武斗的时候，毛主席看见我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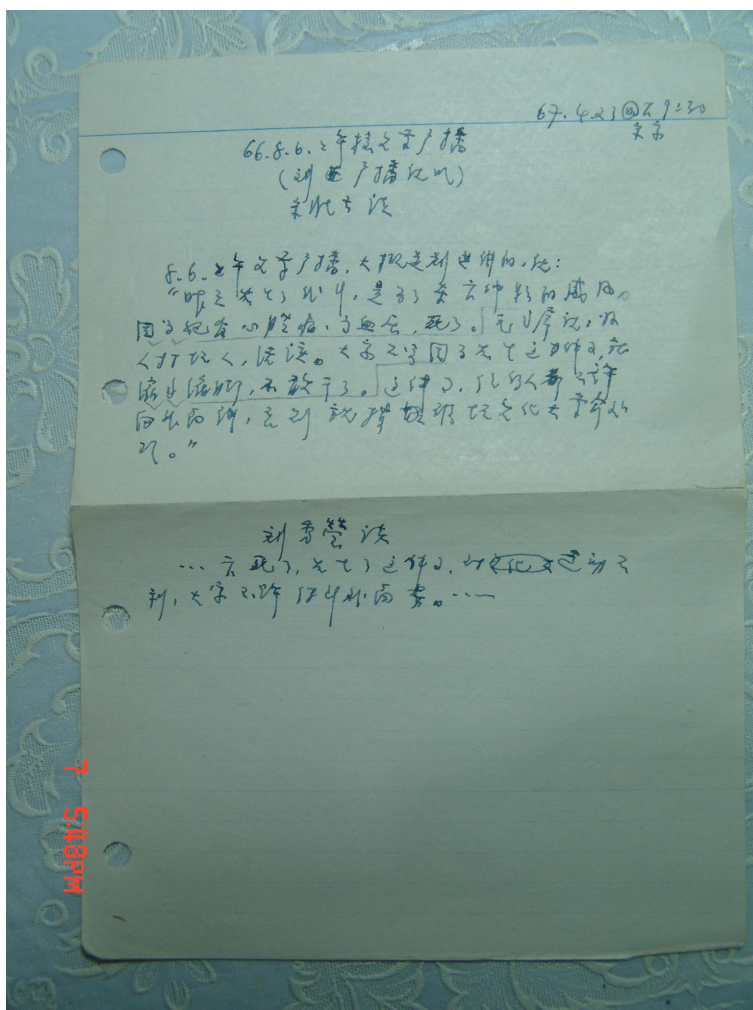
我看到革命同志一个个都平反了，可是又想到当权派不能平反，怕字当头，谁敢给当权派平反。我问梅，我们臭了吗？他说臭了，臭了就不能平反。



### 五、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刘进 1966年8月6日广播稿<sup>1</sup> (影印件)

67.4.23. (日) 9:30 宋家

下图：王晶焘记录：宋淮云、刘秀莹 1967年4月23日回忆刘进 1966年8月6日上午的广播讲话内容。



宋淮云谈：

8.6. 上午文革广播，大概是刘进讲的，说：

“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

<sup>1</sup> 这个广播讲话有四个版本。此为其一。（本刊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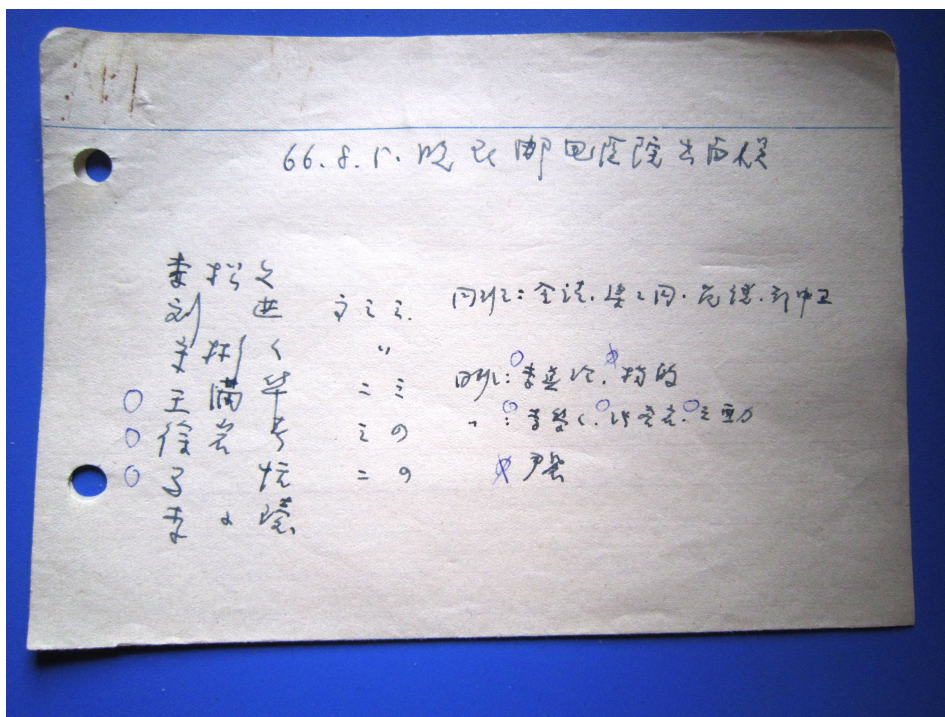
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刘秀莹谈：

……吓死了，发生了这件事，对运动不利，大家不许传到外面去。

### 六、1966年8月5日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名单）<sup>1</sup>（影印件）

下图：王晶焘记录：1966年8月5日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sup>2</sup>



李松文

刘进 高三三 同班：余静<sup>3</sup>. 梁二同. 范锐. 郑中卫<sup>4</sup>

宋彬彬 高三三

<sup>1</sup> 本刊第49期刘进整理“李松文访谈录”所载情况为：1966年8月5日晚，卞仲耘老师送邮电医院后，大夫不敢救治，要求学校开证明才行，李松文老师征得大夫同意可以签名作证后带头签名，并征得6位高年级学生同意代她们写下名字，所写全文为：“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李回忆：“我是抢救前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名单怎么给了王先生。要给估计也是由医院交给他的。”王先生记录的这份名单，前面竖排的也是7人，这7人与李松文所写人员相同，但顺序上有差异。（本刊编者）

<sup>2</sup> 当日晚，女附中出面与王先生谈话的是李松文老师和徐岩春。（本刊编者）

<sup>3</sup> 余静应为余靖。据知情人说，她父亲是北京市委的干部，66年5月就靠边站了。因此，她不可能在场。（本刊编者）

<sup>4</sup> 郑中卫应为郑中伟。（本刊编者）

王满华 高二三

徐岩春 高三四

马恬 高二四

李小凌<sup>2</sup>

同班：李燕玲. 杨鸥

.. : 李黎黎. 张若岩. 王亚力

.. : 尹蜚<sup>1</sup>

---

<sup>1</sup> 尹蜚应为尹斐。(本刊编者)

<sup>2</sup> 李小凌应为李小琦。(本刊编者)

## 【来信选登】

## 1、金秋对“余程之争”的看法：

我从一开始就是该杂志的忠实读者。看到杂志越办越好，我从心里由衷地高兴，并借此向你们尽职尽责的工作表示万分的感谢。

但是近期看到几篇文章，使我不得不表示一点自己的看法。最近几期，贵刊连续登载了关于两本书，《邱会作回忆录》和《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的争论，并将两者之间的争论提到“我们认为，‘余程之争’是关系到史实、史德的大事。学术不是政治，求真求实才是大局。不是学术卷入家事，而是家事干扰了学术。本刊既为学术平台，就应该秉持兼容并包、中立公正之立场，全面反映各方观点。”

以我所见，贵刊这一评论并非妥见，实乃史学一大忌，即将史料与史实混为一谈。个人回忆录，无论其多接近于史实，也仅仅是史料，是回忆者个人对历史的记载与评论。个人回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是允许有差错的，否则就不是真实的个人回忆，而是经过加工整理的，而一经加工，史料的真实就大打折扣，失去了真正的价值。请允许我引用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位史学教授的话：“回忆录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不完美。”一味地对回忆录大加抨击，求全责备，用史实和史学的标准来对回忆录横加指责，实与史学研究之真谛背道而驰。在我看来，这两本书各有千秋，各有独到之处，当然也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们的问世对我们弄清这段历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学是由历史学家来作的，弄清历史史实是史学家的责任，而不是回忆者或其整理者的责任。回忆录也好，其亲人写的口述回忆也罢，都有它们的价值，又何必要非将其中一本书置于死地？研究者应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研究历史上，而不是要争一个“正名”。用邱老的名义，来行个人之目的，在外人看来，实在是“别有用心”之嫌。

对于争论的双方，我认为还是应该放下包袱，多看到两本书的长处，而不是盯在那些不完美的地方。还是那句话，回忆录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不完美。将回忆录当“正史”来作，实在是失之千里的做法。任何一本有价值的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我们为什么不能多看到这些书的价值与长处，看到书对研究历史的贡

献？即使书里有错，也属正常现象，完全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提升到“关系到史实、史德的大事”的吓人高度。真对历史负责，就站出来用史学的角度，综合各家之言来实事求是地撰史，史学家尽可能地对史料去伪存真，你可以不用你不认可的史料，但完全不必对史料加以指责。历史是群言堂，不是哪个人能独断的了的。大家都有资格写历史。甲可以按照其思路和思维撰写，乙也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即使是真正的史学大家，也不敢专断史料，认为自己写的就是“绝对真理”，而其他的说法都是谬误。

我希望贵刊把精力放在历史研究中。尽量避免炒作行为。文革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个人所见，不当之处，抱歉。

金秋

2012年2月29日

于美国弗吉尼亚州

## 2. 何晓铭（福建）谈 81 期的争鸣：

喜读 81 期，本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首先，编者的说明就使人感到很爽朗，开诚布公。研究、探讨问题，避免不了争鸣。”争“就是各持己见吧，“鸣”就是把话说出来。所以，办杂志应当让不同意见都说出来。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争论的双方有矛也好，有盾也罢，都是真家伙。

看了迟泽厚老师《假作真时真亦假——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后，一个严肃有严重的问题摆上桌面，即《心灵的对话》和《历史的回顾》两本书的真伪问题。

在迟老师的文中说“《心灵的对话》和《历史的回顾》两本书，但很多人看后颇多非议，认为水分和一点太多，很多话与邱会作的身份和一贯作风相去甚远，对《邱会作回忆录》甚至对邱本人都有负面影响；继而听说连他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对他写的东西也不认可“——“不看则已，一看目瞪口呆：通篇信口开河，已经到了肆无忌惮、随心所欲的地步”，“看后的感觉是，《对话》和《回顾》这两本书，实际是改头换面的《邱会作回忆录》……一般读者如不对照原著，往往

不易发现,但对熟悉邱会作历史的人来说,则恰恰可以从中发现对原作进行肢解,拼接甚至杜撰的马脚或痕迹”……“模仿父亲的口气,另起炉灶,糊弄读者,则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看了迟老师的话,我也目瞪口呆了!如果《心灵的对话》和《历史的回顾》不是根据邱会作将军和程光交谈整理而成,而是“对原作进行肢解”,“实际是改头换面的《邱会作回忆录》”,那我们面对的就不是学术讨论了,而应首先打假了!至于《心灵的对话》和《历史的回顾》文中的错误,迟老师仅就《工作在中南军区》一章,就指出那么多问题,这在史学著作中也是罕见的。

记得余汝信老师也有这样的断论。

我认为迟泽厚老师、余汝信老师最起码是严肃的学者,最起码不是无中生有,去陷害打击别人的人。他们已经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现在就看程光老师了。邱会作将军的家庭出了两本基础内容相同的书,为什么会是这样,属于家庭内部的事,外人无需过问。但是当《心灵的对话》和《历史的回顾》公开发行,成为社会出版物时,作者和读者首先就构成了诚信关系,作者出书就是让读者信,甚至希望读者赞赏,因此程光老师已经不是愿不愿意回答读者,而是必须回答读者,究竟《心灵的对话》和《历史的回顾》是不是根据邱会作将军和你交谈整理而成的,如果是,迟泽厚、余汝信二位先生就是别有用心的攻击陷害者;如果不是,程光先生就是打着邱会作将军牌子的欺世盗名者,最起码对历史、对史学研究、对读者是不符责任的。历史要求真相!真相就在“是”和“不是”两字中间。真相应该大白!去年,黄吴李邱几位老前辈的书先后发表,在社会上,在史学界,产生了不小反响,听说甚至扰动了领导。我们在悲歌中听前辈在倾诉真相,他们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并启发我们对不少问题进行深思。他们尽力了。

我认为《记忆》杂志把此事引入学术的平台,是您们的历史责任感,也是办《记忆》的使命感。既然如此,那您们就有责任首先弄清真假,您们有责任请程光先生作出正面回答并拿出可靠证据。不论什么样的责任都是神圣的。平心而论,看了程光先生的书,感到他的功底很深,笔头很有力,只是派错了用场。“病木前头万木春”,跌了跟头,爬起来,承认错误,再前进,这是正确的态度。如背其道而行之,则“尔曹身与名俱灭”,但“不废江河万古流”。

2012年3月8日于福建

### 3. 子愚谈《记忆》及对近两期的感想

《记忆》创刊以来，每期都有读。至今已有两年多，感谢编辑的辛苦耕耘，留给历史真实的记忆。

《记忆》上，有些很新鲜的史实。比如 516 文件，516 分子，516 通知……很多国人跟我一样，对这些名词相当陌生。《记忆》曾经刊出宋彬彬的校长文革初期，含冤而死。那篇文章没有引起笔者注意，直到贵刊刊发宋彬彬的文章，才强烈好奇这段惨痛历史。笔者不是北京人，不了解那个学校的历史背景，从来没有听过卞校长的名字。后来，做宋彬彬专辑时，编辑特别介绍该校背景，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帮助大家全面了解事件，十分必要。

《记忆》上有种观点，认为宋彬彬至今没有对当年的行为道歉。这个问题应该很复杂，当年事情的经过至今没有大白于天下。很多细节没有厘清，宋当年是高中生，可能还不满 18 岁。即使今天打死校长的事情发生在校园，也很难以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法律制裁这种行为。当年的红卫兵的确是施暴者，但是他们也被那个时代所害。文革是一场自上而下波及甚广的群众运动，比宋位高权重的人都不能独善其身，他们有谁出来反思当年的行为，为此道歉吗？我们对宋当年的行为又能苛责什么呢！

对文革三缄其口，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在红当兵这个群体里发生。徐子东教授曾经说过，当年红卫兵来抓他父亲，慌忙之间，他父亲穿着睡衣，沿着下水道管道逃脱。对于一个斯文的知识分子，这是何等难看！文革以后，他父亲再没有提起这段经历。

当年相当多的老干部在文革中都受到冲击，他们被批斗，游街，剃牛鬼蛇神头……文革之后这个群体也鲜有人全面回忆这段记忆。集体失语几乎发生在所有亲历文革的群体。文革记忆于是就是一些碎片，在老干部眼里就是迫害，红卫兵看到自己蹉跎青春，盲从，被人利用。知识分子看到了靠边站……

《记忆》81期上，邱会作将军曾经的警卫员蒋平安先生，回忆当年“带”杨成武的经过。这些细节帮助我们了解“杨余傅事件”。这个工作太必要了。多么盼望当年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人都如蒋先生这样，拿事实讲话，还原历史瞬间。



蒋先生的这段回忆，可以清楚看出，当天晚上“带杨”是突然袭击，事前没有任何预警。杨成武当时为解放军代总长，在没有审讯，没有正规的法律程序，甚至是杨本人都毫不知情的前提下，就去杨家“带”人。在杨看来就是迫害吧！蒋先生有这样的描述。“依我看，他（杨成武）还应该感谢林副主席呢，是林彪保护了他。我认为，杨成武包括黄吴李邱，都是跟着毛主席打江山，军政素质很高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贡献！打倒的应该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而不是他们。”笔者恐怕不能苟同这样的看法。首先，林彪不是为了保护杨成武才将杨将军“礼送”出京，只是在文革不断升级的斗争中，客观上让杨成武将军远离斗争的中心。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吧！不同的人，立场不同，对同一事物，观点截然相反。蒋平安先生认为“打倒的应该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这是典型的革命二元论。无论林彪还是“四人帮”，他们都不是文革中，能决定大方向的人。“四人帮”虽然在文革中，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决定他们升迁的力量不是他们本人。江青在两案审判中，曾经毫无避讳地说，自己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她咬谁，她就咬谁。简单的将文革的罪行，归咎林彪或“四人帮”都是将这段历史简单化，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记忆》曾经介绍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录陆续出版以后，对于林彪的这“四大金刚”，最早是在80年“两案”审判时听到过的名字。上初中时，班上同学常传阅与9.13相关的小报。期间，绘声绘色描述林立果选妃，林豆豆招女婿等等。今天看来那些东西也很荒谬，然而那是我们这代人在成长期间能读到唯一的東西。

邱家出了三本书，反响也最热烈。笔者有幸读过黄永胜、李作鹏的回忆录。他们两位老将军是两案审判中，公认的“硬角儿”。81期《记忆》迟泽厚先生对程光先生的书提出诸多质疑，这里笔者想就“汪东兴的要害问题”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汪东兴向外人说了毛主席和江青的不少个人隐私，包括相当多的‘生活作风’问题，背后议论毛主席的长短、扩散对他不利的个人隐私，完全是编造”。请大家去看看李作鹏将军的回忆录，李将军也有同样的记载。他是从汪东兴处知道很多他以前不知道，关于毛的事情，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里指毛的私生活。笔者认为，程光先生的《对话》，关于汪东兴的这段描述应该是可信的。如果是编造，不能李将军也有同样的记载吧？



对上述问题的质疑，如有不敬之处，望原谅，同时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佐证。

当年二战结束以后，盟军在纽伦堡对战犯进行公开审判。大量历史事实被揭示出来，不仅让世人充分认识法西斯的罪行，也深刻教育德国人。而我们对文革这段惨痛的历史，还远谈不上充分认识。《记忆》编辑，在没有任何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做这么有意义的工作，有一天，全体国人会真心感谢你们的工作！

2012年3月16日

于岭南

#### 4. 胡平谈马悲鸣文的失实之处

上期《记忆》，刊出马悲鸣文章，其中提到我仅仅根据传说就断言宋彬彬打死过人。这是掐头去尾，歪曲了我的本意。考虑到记忆的很多读者未必读到过我那篇文章，特附录于后，希望贵刊也发表出来。

说明：我那篇《谈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文，主要是在解释，不是批评。对宋彬彬一事，我罗列出各种不同的说法，除了流传较广的千家驹的说法外，我还引用了《草原启示录》和陶洛诵自传，这两段引文都是说宋没动手的。先前还没人注意到，我也许是第一次引用。我在文章里写道：“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没有材料证明宋彬彬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彬彬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

另外，方影竹那篇文章，就是首发于1996年的《北京之春》。文章写明是十一学校的事，不是师大女附中。我当时就知道文中的宋某某不是指宋彬彬。我在文章里专门解释了，为什么一件本来没有证据的事会到处流传。我写到：“宋彬彬既是名人，想来也深受名气之累。成为名人，就是成为符号，成为代表，成为箭靶子。凡是和这个符号有关的事情，不论好坏，不论真假，都可能挂在你的名下。一般人常常不求甚解，于是往往以讹传讹。当这个符号是正面意义的时候，你是“三千宠爱在一身”，沾了别人很多光；当这个符号是负面意义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千夫所指”，免不了替他人背黑锅了。”

我还讲到：“由于当局的袒护，（老）红卫兵的暴行从未得到哪怕是象征性

的清算，行凶作恶者始终没有被摘拣出来，别人无从区分，这就让那些没有行凶作恶的老红卫兵们也沾上了说不清楚的嫌疑。这该怪谁呢？”

2012年3月2日

